臺大歷史學報第 66 期
2020 年 12 月，頁 97-151

BIBLID1012-8514(2020)66pp.97-151
2020.6.11 收稿，2020.10.6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012_(66).0003

空間換取時間？——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5-1937）

蘇　聖　雄*

提　要

關於蔣中正於中日戰爭初期的戰略，學界常突顯外交運作或是淞滬會戰的地位；相對而言，平津失陷後的華北並未受到如此高的關注。之所以如此，或是因淞滬會戰最終演變為戰爭期間最大規模會戰，吸引世界目光，對全局走向並有關鍵影響。然而，淞滬會戰固然重要，華北作為日軍首先匯聚兵力之處，且為戰爭初期與淞滬平行之主戰場，亦有其重要性。本文從蔣中正的華北戰略切入，考察其戰前、戰爭初期針對華北的整體軍事布局，復聚焦於「空間換取時間」內涵與實踐的探討，俾重新認識這場戰爭的開端。

關鍵詞：蔣中正　法肯豪森　劉峙　盧溝橋事變　淞滬會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1520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E-mail: mhsheng@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戰前的軍事布局
二、開戰之初的軍事布局
三、「決戰」與國軍潰敗
結 語

前 言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887-1975）即刻調兵北上，17 日復於廬山談話會宣誓，若到最後關頭將抗戰到底；月底，華北重鎮北平、天津失陷，蔣中正的「最後關頭」就此到來。國軍面對日軍的戰略為「持久戰」，已廣為人熟知，曾親身參與戰事的學者吳相湘分析指出，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在於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爭取最後勝利，而中國有寬廣縱深、山川錯綜的國土與眾多的人力，是能實施這一戰略的大前提，在軍事學上稱之為「向國內退軍」，通俗的說法是「以空間換取時間」。[1]

吳相湘所言空間換取時間之戰略，確為時人所重視，由於中國軍隊衰弱卻具廣土眾民的特性，這樣的戰法並不難想像。清末民初知名將領蔡鍔（1882-1916）在其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中，提到波耳人反抗英軍（Anglo-Boer War）及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征俄失敗等戰史經驗，指陳中國與他邦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不如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除之」。[2]以軍事學術知名的蔣方震（百里，1882-1938），據稱亦曾多次發表中國制勝之道，在於利用中國地大人眾之優越條件；戰事爆發

1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54-55。

2 蔡鍔輯，《曾胡治兵語錄》（出版地不詳：四川武學官書局，1917），頁 54。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武器不如人的中國不能以血肉之軀抗擊敵人，東南半壁無險可守，退至山岳地區才對中國有利，主戰場應置於平漢鐵路線以西，並以洛陽、襄陽、衡陽「三陽」為根據地。[3]其他文武要員，如毛澤東（1893-1976）、白崇禧（1893-1966）、陳誠（1898-1965）、胡適（1891-1962）、丁文江（1887-1936）等，都有類似空間換取時間的說法。[4]

既然國軍面對日軍的戰略為空間換取時間，暫不論盧溝橋事變之初，戰況之混沌未明，在平津失陷、最後關頭到來之際，直接面對日軍壓迫的華北國軍，理當不爭一城一地，於華北平原及山西、綏遠等廣大空間與日軍周旋。論者因此分析，戰爭初期國軍全局作戰指導要旨為北守東攻：華北採取守勢，構築多線陣地，實施逐次抵抗，重點在阻敵沿平漢線南下；華東方面，以擊滅上海日軍為全部作戰之核心。換言之，國軍戰略係於華北採取守勢，節節固守，以空間換取時間（trade space for time）。[5]

此說是否為然？考諸史料，可以發現不相容的史實。就在 7 月 29 日平津激戰之際，統籌指揮黃河以南中央軍的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1892-1971）上電蔣中正，判斷日軍必將大舉增兵，驅逐在河北的中央部隊，建議國軍應準備大戰，大舉進攻，先發制人，消滅敵在平津一帶勢力，以樹聲威。[6] 8 月初，頗受蔣中正倚重的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在視察華北前線之後，返京向統帥部提議：「我軍如在一星期前採取攻勢，必可將平津敵人殲滅，但

3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 180、184、214-215、225。

4 楊天石，〈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 121-138；楊維真，〈1938 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國史館館刊》第 32 期（2012 年 6 月，臺北），頁 37-38。

5 傅應川，〈抗戰戰略的變遷〉，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第 2 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頁 28-29；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 50 期（2016 年 12 月，臺北），頁 115。

6 〈劉峙呈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29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以下簡稱《蔣檔》），002-090105-00001-06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下再準備攻勢，尚未為晚，因集部隊已不少也。」[7] 8 月 18 日，劉峙已是剛建立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華北平漢線作戰，其再度上電，提出協同南口友軍會攻北平的計畫，[8]蔣中正隨即令劉峙等華北將領率部向平津攻擊前進。[9]

北平是千年古都、華北最大的城市，已為日軍占據，國軍要想反攻奪回，必定十分困難，可預見傷亡龐大，也與一般認識的「空間換取時間」不相符合。如此情態，究應如何理解？本文欲探究這個問題，並延伸探討蔣中正於華北的全盤軍事布局，其戰前規劃與部署為何？戰時實踐過程為何？其間有何變化與困境？由於華北擁有廣大的平原，相較淞滬會戰戰地的長江下游河川遍布且具城市戰性質，更可突顯空間換取時間戰略的運行實況。

相關研究，有全局戰略的演變或蔣中正和戰抉擇之分析、[10]盧溝橋事變及其後續之探討，[11]也有考察整個華北戰事之過程。[12]較深入的軍事

7 〈盧溝橋事件第三十次會報〉（1937 年 8 月 9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280。

8 〈劉峙呈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18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79。

9 〈蔣中正致徐永昌劉峙電〉（1937 年 8 月 19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80。

10 相關研究甚夥，舉要如王建朗，〈抗戰初期國民黨軍事戰略方針述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上海），頁 100-104；余子道，〈中國正面戰場對日戰略的演變〉，《歷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北京），頁 138-152；楊奎松，〈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七七事變爆發 7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22；家近亮子，《蔣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東京：岩波書店，2012），頁 99-144；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245-297；鹿錫俊，《蔣介石の「国際的解決」戦略：1937-1941——「蔣介石日記」から見る日中戦争の深層》（東京：東方書店，2016），頁 11-33；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5-72, 112-113.

11 相關研究亦甚夥，如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55-102；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岩谷將，〈從盧溝橋到上海——再論中日戰爭初期的展開〉、黃自進，〈再探中日戰爭擴大之過程——以盧溝橋事變為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史探討，如蔣緯國（1916-1997）總編纂的《抗日禦侮》，析論國軍華北戰略在遲滯日軍南下，同時集結主力於淞滬發起會戰，藉以移轉日軍作戰線；[13]郭汝瑰（1907-1997）、黃玉章（1928-2018）主編之《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則承襲中國共產黨過去對中國國民黨軍初期抗戰的批判態度，認為國軍初期作戰採取消極陣地防禦，對日軍消耗有限，反造成己方損耗傷亡過大，並經常處於被動地位。[14]就後者而論，既然如前述國軍曾積極規劃反攻平津，可見所謂消極陣地防禦似乎仍可商榷。

質言之，研究現況針對蔣中正於華北的戰略及軍事布局研究分析較少，相關討論多集中於淞滬會戰，重新檢討「空間換取時間」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在華北的實踐者，更是付之闕如，本文即以此為題進行探討。論述時間係從戰前至戰爭初期，由於 1935 年蔣中正剿共大有進展，對日防備積極展開，本文以該年前後論述較多，接著述及 1937 年 7 月戰爭爆發，迄於河北防線崩潰的 9 月。標題「華北」為當時「華北問題」之所稱，即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華北要人鹿鍾麟（1884-1966）認為，華北問題之中心在冀、察，[15]本文主要聚焦於此二省戰事之開展。

中心〉，二文俱收入黃自進主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上冊（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頁 229-268、269-328。

12 如劉鳳翰，〈陸軍與初期抗戰〉，收入氏著，《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191-218；曾景忠，〈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對冀察當局的應戰督導〉，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國史館，1998），頁 85-118；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229-320。

13 蔣緯國總編纂，《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1978），卷 4，頁 3；卷 10，頁 253-254。

1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上冊，頁 309-347；下冊，頁 1222-1227；另見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　第 2 卷：戰時軍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14-30、33-37。

15 〈鹿鍾麟致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26 日），《蔣檔》，002-080200-00485-087。

臺灣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圖書館

一、戰前的軍事布局

（一）國軍中央針對華北的戰略構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囊括整個中國東北，爾後發動熱河作戰，越過長城，一度到達北平近郊。[16]因此，對國民政府來說，中日全面開戰之際，日軍越過長城由北而南進攻，可以輕易預見。

對於日軍遲早到來的進攻，國軍已籌謀作戰計畫。當時國軍權力中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全國軍事最高機關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會），其下設有職司研擬作戰計畫的參謀本部。由於蔣身兼參謀總長，且作戰計畫最終由其批核審定，從這些計畫的擬定與演變，得以窺見蔣的軍事戰略。[17]

隨著剿共軍事的進展，蔣中正的軍事思考從圍剿共軍加速轉換到抗戰準備，[18]相關軍事規劃與部署更顯清晰。全面戰爭爆發前夕的全國作戰計畫有兩份，即 1937 年初參謀本部修訂完成「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的「甲案」與「乙案」。「甲案」作戰計畫係採守勢作戰，同時發揮攻擊精神，擬於華北與日軍「決戰」或「會戰」；不得已時，再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19]「乙案」作戰計畫目標遠大，擬攘擊日軍於長城迤北之線，乘機以主力進攻東北，計畫前提或假定世界大戰爆發之際，日軍將與蘇聯開戰，國軍藉機收復東北失土。[20]

---

16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庄司潤一郎、川島真，《決定版　日中戰争》（東京：新潮社，2018），頁 23、34。

17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出版公司，2018），頁 37-40、54-55、66-67。

18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一九二八－三七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7），頁 200-211。

19 〈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1937 年 1 月），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3-23；〈1937 年作戰計畫（甲）〉，《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戰史會檔》），七八七-2132。

20 〈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乙案）〉（1937 年 1 月），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

臺灣大學圖書館

兩份作戰計畫先前經過不斷修改，對於華北皆不擬輕易放棄，即便中日兩軍戰力相差巨大，國軍守勢之餘，仍保積極精神，趁隙轉取攻勢。亦即，國軍節節固守、相機後撤、引敵深入等所謂「空間換取時間」，是計畫的次一步；開戰之初國軍保持積極精神，於各陣線死守或趁勢進攻，是計畫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21]

作戰計畫既有於第一線攻防進取和向後節節撤退兩種層次，孰輕孰重，難免有不同看法。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1891-1977）參與 1935 年年中的峨嵋軍官訓練團，會後在日記記錄訓練團宗旨，便是突顯後一面向：「我們今天的形勢，是華北雖受壓迫太甚，但在廣大國土上，仍是金甌無缺，然不戰則已，一戰則最初我或可小勝，以後就不得不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至平漢路以西地區，作持久戰。」[22]蔣中正在日記亦常有重視大後方的記載，同年日記云：「對倭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線，而以川黔陝甘為核心」、[23]「強國之國防在重邊疆，取攻勢；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24]

參與機宜的德國軍事顧問，對於過度強調後撤的戰略不以為然，多次於華北實地考察提出意見，強調華北防禦的重要性。[25] 1934 年，蔣中正與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1866-1936）有幾次辯論，也是圍繞在華北戰略地位。該年 4、5 月間，兩人會商數次，蔣主張對日國防重點區域，應該在長江流域而不在華北，他對塞克特說一旦中日開戰，準備放棄華北而集中全部力量保衛長江流域，只有 16%的軍事預算

冊，頁 23-34；〈1937 年作戰計畫（乙）〉，《戰史會檔》，七八七-2133。

21 歷年國防作戰計畫的演變，參見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新史學》第 31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臺北），頁 129-198。

22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頁 255。

23 《蔣中正日記》（史丹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1935 年 7 月 9 日。

24 《蔣中正日記》，1935 年 7 月 11 日。蔣中正身為峨嵋軍官訓練團團長，應是將當時的戰略構想向幹部與學員透露，乃有萬耀煌日記之所錄。

25 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頁 156-15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可以用於華北，因而該處僅能選擇戰略要點構築國防工事。塞克特認為，如此將造成日軍輕易地繞過要塞，長驅直入，於整體抗戰大局不利。蔣中正回應，從政治上來看，長江以南遠比江北地區重要，況且華北的地方部隊沒有任何軍事價值。塞克特詢問：「那麼，是否在華北一旦危險時，可以抽調在江西剿共的部隊北上？」蔣給予否定答案，指陳：「當務之急是剿共，在江西剿匪戰事未完成之前，不可能抽調主力部隊去對付日本人。」塞克特最後只能表示，對蔣中正的華北防禦方案不承擔任何責任。[26]

1935 年 8 月，江西剿共已大有進展，共軍離開其贛南根據地。接替塞克特出任總顧問的法肯豪森，上呈蔣一份〈應付時局對策〉，指出向前方作戰的必要，亦提及華北的重要性。[27]整理其所說，概可分軍事與政略兩個層面。軍事上，若不戰而放棄華北，將予日軍行動自由，日軍易於集中兵力攻占要地與交通線，國軍士氣將遭受重大損害。政略上，過早放棄華北或沿海，將失去國民政府最重要的城市與工廠，國軍難以持久抗戰，且日方必將扶植滿洲國皇帝溥儀（1906-1967）回北平，達到其分化與控制中國之目的，對國民政府的國際聲望有極不良的影響。因此，法肯豪森主張向北推進，取戰略守勢且採內線作戰，「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28]藉由前線的激烈戰鬥，促使有利害關係的列強採積極態度起而干涉。[29]

---

26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312-313。

27 〈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0 日），《蔣檔》，002-080102-00054-002。

28 原文之「滄縣－保定」，可見蔣中正在旁之劃線。當時時將滄縣稱作滄州。

29 法肯豪森也沒有忽略東南沿海與大後方，他亦指出國軍最後防地為富庶又形勢安全的四川，本文特別突顯其關注華北防禦的部分。〈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0 日），《蔣檔》，002-080102-00054-002。1937 年 4 月 9 日，法肯豪森又呈送蔣〈北正面防務之研究〉，再度強調華北的戰略地位。〈北正面防務之研究〉（1937 年 4 月 9 日），《蔣檔》，002-080102-00055-003。德國軍事顧問與國軍國防作戰計畫之關係，可參閱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頁 169-176。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何以塞克特、法肯豪森等德國軍事顧問十分重視於第一線攻防進取？其緣故或與當時德國軍事思想與其個人作戰經驗有關。塞克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東線戰場擔任軍參謀長，對俄作戰接連獲勝，這些經驗使其相信，訓練、裝備、機動性、攻擊精神、大膽的戰略動作得以彌補數量不足，即使現代軍隊擁有強大防禦火力和工事，堅決進攻仍是勝利的關鍵；其路線在離華後，為法肯豪森所繼承。[30]

法肯豪森的一戰經驗，亦可說明其為何向蔣中正建議第一線陣地防禦然後再伺機進攻。他曾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當時德軍為突破僵持不下的陣地，於 1916 年 2 月向通往巴黎的要道凡爾登進攻，經過數個月的作戰，雙方損失近百萬人，極其慘烈，從這場大戰可見陣地防禦的巨大效用。後來，法肯豪森派赴德國盟國土耳其，擔任土耳其第七軍凱末爾（Mustafa Kemal Pasha，後改名 Kamâl Atatürk，即土耳其國父，1881-1938）的參謀長等職務。1918 年 3 月和 5 月，他親自指揮與規劃兩次土軍在巴勒斯坦的對英作戰，利用地理環境、壕溝陣地阻擋英軍，使之傷亡嚴重，尤其 5 月那次作戰，在遲滯消耗英軍以後，法肯豪森看好時機發動大規模反攻，致使英軍拋戈棄甲，物資損失甚鉅，土軍獲得大勝。[31]

法肯豪森這些經驗，直接反映在〈應付時局對策〉，他於報告中強

30 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一九一四－一九三七）》（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 20、234-236、274-277。

31 Eran Dolev, *Allenby's Military Medicine: Life and Death in World War I Palestine*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pp. 122-123. Edmund Allenby 是當時英軍在巴勒斯坦的指揮官。法肯豪森由於 1918 年 3 月與 5 月對抗英軍強渡約旦河的進攻，指揮與計畫之傑出表現，獲德皇威廉二世授予德軍最高勳章「功勳勳章」（Pour le Mérite）。在 1918 年戰爭結束前，法肯豪森係德國駐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全權代表。Hsi-Huey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 (Assen: Van Gorcum, 1978), p. 21; "General der Infanterie z.V.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http://www.specialcamp11.co.uk/General%20der%20Infanterie%20Alexander%20von%20Falkenhausen.htm (accessed May 28, 2020)，此係二戰戰俘的網站，網頁內容為法肯豪森簡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調，自己在一戰時歷任各級參謀長，自師以至方面（集團）軍四年半之久，無間斷負一切責任，在俄境、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及阿拉伯等地，作戰兵力與物資皆與敵懸殊，補給線與聯絡線有數千公里之遙，困難達到極點，仍能與兵力物資俱優、後方聯絡良好之敵相持甚久，屢獲勝利。他以這些經歷試圖說服蔣中正採納其建議。[32]

既然德國軍事顧問在國軍作用甚大，[33]法肯豪森的長篇意見，當可獲蔣中正一定重視。[34]後來參謀本部的計畫與法肯豪森建議若合符節，顯示其應發揮一定作用。[35]其實，蔣中正雖想過開戰不久即向後撤退到平漢線，但其於日本所受軍事薰陶，也是死守陣地並發揮進攻精神的作戰方法。其曾自言個人軍事思想受兩部在日所讀之德國兵書影響最大，一為《巴爾克戰術書》，一為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所著之《戰爭論》，前者尤其圈點數回，看過六遍以上。[36]由於蔣自言兩書是在日本求學時覓得，故當時所閱《戰爭論》應是日譯本《大戰學

32 〈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0 日），《蔣檔》，002-080102-00054-002。

33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17-222. 查考法肯豪森的工作報告，可注意到他多次與國軍高層商談時局、提供意見，如與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劉光談時局及加強北正面之緊急處置，與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冀浩、副廳長袁績熙談陸軍編制、動員準備或商討冀省日本兵力之位置、人數及企圖；與參謀本部城塞組副主任李青協商國防要塞按計畫之工作；向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報告並協商一般國防問題；與蔣方震商談對中國編制、裝備、武裝之利用等。〈法肯豪森工作週報〉（1937 年 1 月 11-16 日、1 月 18-23 日、1 月 25-30 日、2 月 1-6 日、2 月 8-13 日、3 月 8-13 日、3 月 15-20 日、3 月 22-27 日、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4 月 5-10 日），《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001-070004-00010-006。

34 〈馮・法肯豪森和中國作戰部隊的改編〉（1934 年 12 月），收入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善豪翻譯，《德國外交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170。

35 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頁 175-176。

36 由於蔣在日本軍校學習時間有限，在日自學兵書對其軍事思想之奠基有關鍵作用。蔣中正，〈對研讀克勞塞維茨「戰爭原理」的提示〉（1951 年 7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24》（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37]書中強調防禦的重要，並言說於適當機會發動攻擊，倡導「攻勢防禦」。[38]至於影響蔣更深的《巴爾克戰術書》，是德國軍官威廉・巴爾克（William Balck, 1858-1924）所著，德文版於 1896 年出版（原書名為《戰術》〔*Tactics*〕），[39]未幾出版日譯版，題名《巴爾克戰術書》。[40]書中在《戰爭論》基礎上強調「決戰防禦」，認為守者若不取攻勢，則攻者雖遭損害，略加休息即可恢復再舉，故抵禦時苟遇有利時機，應繼以攻擊；防禦時應重視準備數處陣地工事，愈早構築愈好，即便後來沒有用到，也可收誘惑敵兵之利。該書另有專節述論持久戰，將「持久戰」區分為「持久戰」與「抑留戰」，前者多專取守勢，後者則含有攻勢之意，並可由威脅攻擊而變為猛烈之進攻。[41]要之，攻勢防禦、強調攻擊精神等，本是西方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戰術主流，[42]《巴爾克戰術書》可說承襲此一潮流而為蔣所研習。

我們無法直接評估德國軍事顧問或德國兵書《巴爾克戰術書》與《戰爭論》對蔣中正抗日軍事戰略的直接影響，不過從蔣核定的戰前作戰計畫最後版本「甲案」來看，其內容的確與他們的軍事見解相呼應。面對日軍進攻，該計畫規定開戰之初國軍主力配置於滄保線（河北滄州、河間、保定之線），保持重點於平漢路方面，對經北平、天津之敵軍「實行決戰」。若開戰之初，國軍主力不能進出滄保線，則主力改使用於德

37 該版本於 1915 年迻譯為中文版。格魯塞威止著，瞿壽禔重譯，《大戰學理》（北京：武學官書局，1915）；森潤三郎，《鷗外森林太郎》（東京：丸井書店，1942），頁 23、106-107。

38 克勞塞維茨著，張柏亭編譯，《戰爭論》（臺北：國防部，1956），第 6 篇（上），頁 110-113。

39 William Balck, *Development of Tactics-World War*, trans. Harry Bell (Fort Leavenworth, Kans.: General Service Schools Press, 1922).

40 該書後來重出 4 版。司馬亨太郎訳，《巴爾克戰術書》（東京：干城堂，1913-1914 年大改訂第 4 版），共 18 卷。

41 司馬亨太郎訳，《巴爾克戰術書》第 3 卷，頁 114-132、165-166。

42 此一潮流，甚至演變為「攻勢崇拜」。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頁 341-3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線（德州、束鹿、石家莊附近之線），仍保持重點於平漢路方面，對敵進行「第一次會戰」。又若國軍不能進出德石線，則國軍的冀察綏部隊逐次占領預定陣地，行持久戰，遲滯敵軍前進；主力占領黃河下游之既設陣地，左翼與山西側面陣地相連繫，進行攻勢防禦。該計畫雖考慮節節後撤，仍以為死守城防有其必要，後撤時擬於天津、北平、青島、上海、福州、廣州等大城市死力固守。[43]（參閱圖一）

開戰初期，蔣中正對軍隊的指示，亦呼應前述戰法。在平津失陷後的一次對全軍訓示，他指出日軍要求速戰速決，國軍就要「持久戰消耗戰」，固守自己的陣地，堅忍不退，切實注意縱深的配備，多築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當日軍已陷於被動，國軍就站在主動的地位「乘機出擊」。蔣並且頒布「抗敵戰術彙錄」12 條，內容處處強調固守據點，堅築陣地。[44]蔣當時常將「持久戰」與「消耗戰」並稱，後者的內涵，與一戰的大規模陣地戰相似，欲藉陸續不斷的後方增援穩固原定陣線，拉長抗戰時間以消耗敵力。[45]

---

43 至於華北戰場與上海戰場之間的關係，上海戰場作戰方針是根本擊滅敵軍登陸的企圖，華北戰場是與敵軍決戰、會戰、持久戰；亦即，兩個戰場都將採取積極行動。〈1937 年作戰計畫（甲）〉，《戰史會檔》，七八七-2132。如是則兩個戰場看似皆投入重兵作戰，兵力分散，處處薄弱。其實，國軍原來的計畫是以華北為主戰場，淞滬戰場的規模有一定限度，只是後來隨著局勢發展，上海重要性突起。德國軍事顧問於淞滬會戰後檢討謂：「淞滬會戰，這場由中國決策層峰所開啟的會戰，國軍方面在其中投入了極大量的兵力，其規模之大，遠超過原始的估算。……**蔣介石委員長對於保有上海給予了過大的評價，將戰爭指導中的重點，從華北移往華中方面，係違背了原始的構想**，如此一來，原先計畫中頗有勝算的華北攻勢，將因此而無法實施。」佚名作，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新北：老戰友工作室，2020），頁 95。粗體字為筆者所加，下同。

44 蔣中正，〈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4》（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605-616。

45 蔣中正，〈最近軍事與外交〉，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4》，頁 620；《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本月反省錄」。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華北形勢概要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底圖出自 Google Map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國軍的部署與人事

既然蔣中正如此重視陣地防禦，防禦工事的構築亦為其所重，這或也部分受德國軍事顧問的影響。有鑑於一戰西線壕溝戰或陣地戰的成效，戰後許多以守勢為主的國家，競相構築固定防線，最著名者為法國興築之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德國顧問引進此經驗，協助國軍於各地建立國防工事，以備日後對日之壕溝戰、陣地戰。[46]

1933 年底，參謀本部之下成立城塞組，[47]按照國防作戰計畫，規劃全國工事構築，參謀本部人員並親赴前線視察，德國顧問也參與其中。據曾在參謀本部擔任作戰處長的尹呈輔（1892-1976）回憶，其主要工作之一為各種防線之設計，為此經常冒著寒暑，不避風雨，陪同德國顧問克魯格（Kluge）到各地勘查地形，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除了長江的陣線，華北或近華北的灘河防線、漳新防線、海州防線等，均由他與德國顧問親自查勘擬訂。[48]

蔣中正親自督導工事構築。首都南京、上海、武漢等長江中下游是國民政府核心區域，於此構築工事較易，不過對於華北，蔣也有所推動。1933 年長城戰役時，他便屢電華北將領堅築工事。[49]時為德國軍事總顧問的佛采爾（Georg Wetzell, 1869-1947）對蔣的指示相當肯定，致函表示「仰見總座攻擊精神，莫名欽佩，顧問不才，亦完全此種心理」，建議國軍應「保持攻擊精神，加堅陣地工事」。[50]

---

46 李君山，〈抗戰前軍用教範的初步考察（1931-193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1 期（2006 年 10 月，臺北），頁 87-88；J. E. Kaufmann and H. W. Kaufmann, *Fortress France: The Maginot Line and French Defenses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6), pp. 4-5.

47 陳長河，〈國民黨政府參謀本部組織沿革概述〉，《歷史檔案》1988 年第 1 期（北京），頁 111。

48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 38-39。

49 〈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2 年 3 月 17 日）、〈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2 年 4 月 22 日），《蔣檔》，002-010200-00080-022、002-020200-00016-131。

50 〈佛采爾致蔣中正函〉（1932 年 3 月 24 日），《蔣檔》，002-080103-00026-002。

臺灣大學圖書館

何應欽（1890-1987）在華北統籌，派員至各處視察，並策定防禦工事構築計畫，察哈爾之防禦工事，按中央所撥款數，擇要開辦，平津方面擬待樹木繁盛即秘密動工。[51]隨後駐紮在北平近郊的中央軍，在永定河右岸於夜間秘密構築強固工事。[52] 1935 年 6 月何梅協定前後，中央軍退出河北，工事構築僅能藉地方軍進行。毗鄰河北而尚在中央掌握的河南，成為工事構築重點。當時剿共軍事大幅進展，蔣中正已有更多精力對日備戰，他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在滎陽、汜水線以西至洛陽、新安之間，北沿黃河、南依嵩山山脈南麓，將重要地點建築永久工事，其他如開封、鄭州、歸德、蘭封沿黃河之重要地點，亦仿此建成永久工事；另下令沿黃河河堤造林，不為環境保育，而為日後戰事的天然屏障。[53]

除了劉峙主導的豫北工事，華北及其周圍尚有徐州、鞏洛、開封、商邱、蘭封、魯南、亳縣等工事，次第開工。[54]全面戰爭爆發前一個月，工事構築已有一定成果，有中央軍主導者，亦有地方軍負責者。[55]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地方軍領袖宋哲元（1885-1940）不贊成工事構築，其轄境清豐陣地因此暫緩辦理。[56]

工事構築最多之處是防禦重點，既然豫北工事數量遠超過其他各處，可知最重要的是劉峙集團。劉峙字經扶，為蔣中正麾下核心將領，有「常勝將軍」之稱。[57] 1930 年起，劉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開府汴梁，1931 年 1 月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開封行營主任；11 月行營撤銷，改任

51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秘書長室文電日報表〉（1934 年 3 月 20 日），《蔣檔》，002-080200-00433-060；〈朱培德唐生智致蔣中正電〉（1934 年 4 月 28 日），《蔣檔》，002-080200-00162-115。

52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頁 5。

53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 337-340。

54 〈首都警衛執行部各項工程進度狀況旬報表〉（1936 年 10 月 6 日），《蔣檔》，002-080102-00053-004。

55 〈已成各項國防工事報告表〉（1937 年 6 月 7 日），《蔣檔》，002-080102-00056-002。

56 〈各地國防工事進展概況報告表〉（1937 年 6 月 7 日），《蔣檔》，002-080102-00056-002。

57 楊維真，〈推薦序〉，收入劉峙著，劉滌宏編，《高級傳令兵：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臺北：秀威資訊，2019），頁 11-1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駐豫特派綏靖主任，仍兼豫省主席。1932 年參與豫鄂皖三省剿共軍事，屢獲戰功，國民政府特令將新集改稱經扶縣，以示紀功之意。旋以日軍進攻華北長城各口，劉峙奉令返豫坐鎮。1935 年晉敘陸軍二級上將，12 月改任豫皖綏靖公署主任。[58]

劉峙在河南除了構築前述工事，蔣中正亦指示其迅作整個防禦計畫，並令洛陽軍分校與駐洛各部隊依計畫實施局部演習。[59]蔣又令劉徵工濬河，因為黃河以北的衛河、沁河、淇河皆為重要防線，尤以衛河最重要，將來擬以新鄉為黃河北岸唯一據點，以衛河為屏障。關於防禦計畫，蔣再三提醒劉峙應即分期按步實施，由劉親自負責主持監督，不必待中央之批准，即以現在駐豫各部隊及洛陽軍分校劃分任務。如此大動作進行防禦準備，必將驚動日方，蔣對此也有計及，要劉峙實施時必須秘密，凡暴露或交通繁忙之處，最好利用夜間施行，最重要之工事區域即派隊駐防，一概不許閒人進入其區域範圍。蔣又提到日本最近將在鄭州設立領事館，此專為偵查河南一切之動作，劉應特別慎密防範，適當應付周旋，不可稍露反日行跡，免其藉口。[60]

劉峙坐鎮河南，擔任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名義上管轄豫、皖兩省部隊，實際上權力更廣，蔣中正明令以劉整理與訓練隴海線及其以南地區各部隊，另外徐海蚌淮地區各部隊雖歸衛立煌（1897-1960）整理與訓練，亦歸劉峙統轄。[61] 1936 年底西安事變期間，劉峙任討逆軍前敵總司令，一度統率龐大中央軍進逼西安叛軍，事變後負責收編整理東北軍的工作。[62]

經過數年經營，劉峙集團可說是蔣中正部署於黃河以南的一大戰略

58 傅亞夫，〈劉峙先生傳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2 輯（臺北：國史館，1994），頁 475-481。

59 〈蔣中正致劉峙電〉（1935 年 2 月 12 日），《蔣檔》，002-020200-00023-037。

60 〈蔣中正致劉峙電〉（1935 年 6 月 27 日），《蔣檔》，002-080200-00233-067。

61 〈蔣中正致朱培德電〉（1935 年 1 月 20 日），《蔣檔》，002-080200-00416-025。

62 劉峙，《我的回憶》（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頁 136-142；〈劉峙致蔣中正電〉（1937 年 5 月 8 日），《蔣檔》，002-080200-00482-046。

臺灣大學歷史系圖書館

部隊，分布於隴海線、徐海地區，戰力較強的師級部隊，有駐徐州的第一師李鐵軍（1903-2002）部、駐潼關的第二師鄭洞國（1903-1991）部、駐信陽的第十師李默庵（1904-2001）部、駐咸陽的第二十五師關麟徵（1905-1980）部、駐歸德的第七十八師李文（1905-1977）部、駐信陽的第八十三師劉戡（1906-1948）部、駐蚌埠的第八十五師陳鐵（1898-1982）部，這些部隊皆為調整師，為後來蔣中正調兵北上的基礎。[63]

其中，可注意的是胡宗南（1896-1962）、孫連仲（1893-1990）與衛立煌，他們是上列調整師的上級長官，組成劉峙集團下的次集團。胡宗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所部（1A，轄 1D、78D）原為剿共主力，西安事變後的 1937 年 5 月，其第一軍全軍東移徐州，軍部及所轄第一師駐徐州近郊，第七十八師駐歸德，負津浦、隴海兩路警備任務。[64]孫連仲原為西北軍系，之後中央化，所部（30A，轄 27D、30D、31D、S44B）經剿共戰事，1935 年 10 月初移駐蘇北淮陰清江浦，修築國防工事，西安事變後移駐河南信陽確山一帶。[65]衛立煌是行伍出身，所部（14A，轄 10D、83D、85D）係蔣中正「嫡系中的雜牌」，於豫鄂皖邊區清剿共軍頗著功績，同時兼任徐海分區綏靖司令。[66]

中央軍在華北另一戰略部隊是湯恩伯（1899-1954）部。1935 年升

63 國軍調整師是當時經過整理補充、較具戰力的部隊，共有 30 個師，分兩梯次編成。1936 年的 20 個調整師是教導總隊、2D、25D、36D、87D、11D、14D、67D、57D、2D 補充旅、3D、4D、9D、10D、27D、6D、80D、83D、88D、89D；1937 年調整的 10 個師是 1D、5D、13D、16D、51D、56D、58D、78D、85D、98D。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臺北：國史館，2010），頁 69-75。為簡明呈現，本文在括號、圖表、附註說明軍隊番號時，採用軍事符號：軍 A（Army），師 D（Division，KD 騎兵師），旅 B（Brigade，獨立旅 SB）。

64 於憑遠、羅冷梅編纂，葉霞翟、胡為真校訂，《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 79-80。

65 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編，《孫連仲回憶錄》（臺北：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1962），頁 39-41。

66 爾後衛立煌以綏靖事忙，該職以胡宗南代理。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 11、68-71、148；〈何應欽等致蔣中正電〉（1937 年 6 月 25 日），《蔣檔》，002-080200-00484-0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第十三軍軍長的湯恩伯，在豫鄂皖、贛南等地圍剿共軍功績頗彰，率部追擊北上共軍，任陝西剿匪善後辦事處主任。[67] 1936 年底，內蒙軍受日軍唆使，在綏遠發動事端，晉綏軍出擊抗敵，第十三軍就近從陝北入綏作戰，湯恩伯隨後出任晉綏剿匪軍第二路軍司令官。[68]作戰結束後，第十三軍留在綏遠，所轄兩大主力第四師王萬齡（1900-1992）部駐集寧（平地泉），第八十九師王仲廉（1904-1991）部駐豐鎮，為即將爆發的對日衝突做準備。[69]

中央軍而外，華北廣大區域多由地方軍掌握，系統複雜。據國軍中央 1935 年調查華北各軍系人數，張學良（1901-2001）部有 84,100 人，閻錫山（1883-1960）部有 42,900 人，商震（1888-1978）部有 16,600 人，韓復榘（1890-1938）部有 42,500 人，宋哲元部有 28,000 人，[70]概分屬東北軍、晉綏軍、西北軍三大軍系。

隨著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簽訂，華北政治分布有較大的變化。原來駐河北的于學忠（1890-1964）部（東北軍）向省外撤出，宋哲元部在日方支持下，勢力返歸察哈爾、河北，河北成為宋哲元（西北軍）、商震（晉綏軍）、萬福麟（1880-1951）（東北軍）共治之局。1935 年底，經日本壓力與華北地方各派鬥爭，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親中央的商震改調河南，任豫省政府主席，冀察漸成宋哲元獨大的局面；至於山東、山西兩省，仍由與南京方面不即不離的韓復榘（西北軍）、閻錫山（晉綏軍）掌控。[71]

---

67 沈荊唐，〈湯恩伯〉，收入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 246-247。

68 傅作義，〈綏戰經過詳記〉，《軍事雜誌》第 100 期（1937，南京），頁 287-288。

69 兩個師都屬調整師。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頁 71、73；王仲廉，《征塵回憶》（臺北：作者印行，1978），頁 139、141-144。

70 〈全國陸軍數量表〉（1935 年 3 月 5 日），《國民政府》，001-070000-00007-003。

71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頁 32-33、46；李君山，〈1935 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國派系之爭——由「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戰前中日關係之複雜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出版中心

宋哲元對蔣中正與日本兩面討好，皆不得罪，所駐之冀察成為南京中央與日方之間的緩衝地帶。[72]宋部乘此機會於夾縫中大幅擴展。全面戰爭爆發前，據日人的調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已遠逾軍級規模，下轄第三十七師馮治安（1896-1954）部（駐西苑，約 15,750 人）、第三十八師張自忠（1891-1940）部（駐南苑，約 15,400 人）、第一三二師趙登禹(1898-1937)部(駐河間,約 15,000 人)、第一四三師劉汝明(1895-1975)部（駐張家口，約 15,100 人）等 4 個師及其他部隊，共約 7.5 萬人。[73]

將中央軍、地方軍之實際部署對比戰前作戰計畫（甲案），可推知國軍開戰後，將以地方軍宋哲元部就地抵抗，拒止日軍前進，然後中央軍劉峙集團沿平漢線北上，視情況盡量向北推進至預定防線與日軍決戰、會戰，中央軍在察南的湯恩伯部將在平綏線上，與地方部隊共同側擊南下日軍。[74]蔣中正在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已有較完整的輪廓。

二、開戰之初的軍事布局

（一）派兵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夜間，盧溝橋事變爆發。次日，蔣中正決定調動劉峙集團的 4 個師，電劉峙將開封以西部隊先派一師赴黃河以北，開封以東部隊暫不開動，其餘再準備兩師可隨時調動，並在開封、鄭州集中車輛，俾兩師以上部隊可隨時開動。[75]是日，蔣自記：「決心應戰，此其

72 土肥原賢二刊行会，《秘録　土肥原賢二——日中友好の捨石》（東京：芙蓉書房，1972），頁 278、295-296。

73 冀察另有東北軍萬福麟、馮占海等部，與宋部加計兵力約 15.3 萬人。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頁 138-141。

74 〈1937 年作戰計畫（甲）〉，《戰史會檔》，七八七-2132。

75 〈蔣中正致劉峙電〉、〈蔣中正致徐永昌程潛電〉（1937 年 7 月 8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08、002-020300-00001-00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時乎？」[76]

9 日，蔣令人在山東的宋哲元駐保定指揮，並令人在重慶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即刻飛返南京。[77]此時確定增援的 4 個師，為孫連仲部第二十七師、第三十一師，及龐炳勳（1879-1963）部的第三十九師和高桂滋（1891-1959）部的第八十四師。這些部隊皆屬西北軍，為中央收編，現屬劉峙集團，北上歸宋哲元指揮。[78]所以先派這些部隊，或是皆屬西北軍，與宋部聯繫較易，也免生猜疑。

未幾，蔣下令第二十一師、第二十五師動員候調。[79]第二十一師原為劉珍年（1898-1935）部，乃山東的地方部隊為中央收編者，[80]第二十五師係關麟徵部，屬中央軍精銳，長城戰役時曾於華北作戰。至是，規劃增援兵力已達 6 個師。12 日，蔣考慮將中央軍集中於保定。[81]

蔣抱持應戰而不求戰的方針。[82]不過面對戰事可能擴大，他也絲毫不避，一方面展示軍事實力，示以決心，威嚇日方停止挑釁，「戢其野心」以求和平；一方面希望藉此機會，要求日軍撤退豐台的部隊，或廢止冀東的偽組織，進一步使中央軍能進駐華北。因此，他「積極運兵北進備戰」，[83]復電令「倭寇挑釁，無論其用意如何，我軍應準備全部動員，各地皆令戒嚴，並準備宣戰手續」。[84]全部動員之令隨即付諸實施，日方立刻偵知國軍於隴海線集結中央軍北上，空軍亦大舉出動。[85]

---

76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8、9 日。

77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 272-273、328、340-341。

78 〈孫連仲致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13；〈蔣中正致孫連仲等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90105-00003-532。

79 〈蔣中正致徐永昌等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15。

80 蘇聖雄，〈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國史館館刊》第 28 期（2011 年 6 月，臺北），頁 31-71。

81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12 日。

82 〈蔣中正致馮治安等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17。

83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9 日、10 日「本周反省錄」、14 日。

84 〈蔣中正致徐永昌等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15。

8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事發一週，蔣判斷有必要派遣中央大員北上坐鎮。原作戰計畫（甲案）規劃於徐州、鄭州設置行營，蔣此時決定向北推進，於石家莊設置行營，以徐永昌（1887-1959）為行營主任，[86]林蔚（1890-1955）為行營參謀長。[87]

事發二週，劉峙集團進入河北的部隊益增，除前述中央軍關麟徵部（25D），戰前規劃的中央軍衛立煌所屬李默庵部（10D）、孫連仲部（27D、30D、31D、S44B）皆已進入河北，另外地方軍商震部（141D、142D）、龐炳勳部（39D）等亦北上增援。[88]值得注意的是俞濟時（1904-1990）部（58D），該部係中央嫡系調整師，原遠駐湖南，現也調派北上增援。[89]

（二）平津之役及後續的增援

盧溝橋事發之初，蔣中正屢電宋哲元注意平津防務，惟宋對中央不甚信任，且對和平解決懷抱希望。[90]他因此撤除北平備戰設施，並將第

雲新聞社，1967），頁 435-436。

86 徐永昌係山西人，晉綏軍將領，曾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 年春，調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獲蔣中正信任。此次安排其赴華北出任行營主任，代表蔣主持河北軍事，除蔣之信賴外，原因其一或為徐係華北要人，對該地頗為熟悉，且資歷深、地位高；其二或為徐任職中央軍事機關，掌握機宜，或較能理解中央當前戰略思考。《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 月 8、9、10、11、15、16、19、25 日，7 月 13、23-24 日；葉銘，〈徐永昌與抗戰初期華北戰局（1937 年 7 月-9 月）〉，《政大史粹》第 31 期（2017 年 3 月，臺北），頁 51-78。

87 林蔚與蔣同為浙江人，曾任參謀本部廳長、軍委會銓敘廳廳長，是蔣中正的核心參謀。林蔚原著，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1）》（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頁 V-VII。

88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6120700400，〈事變勃發以後河北省內ニ侵入セル支那軍兵力一覽〉（昭和 12 年 7 月 23 日調查），《大東亜戦争海軍戦史本紀巻 1》（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9 〈蔣中正致徐永昌電〉（1937 年 7 月 12 日），《蔣檔》，002-090106-00012-074。

90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2 期（1991 年 2 月，臺北），頁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九軍參謀擬定的作戰命令予以擱置。[91]直至 7 月 26 日，宋猶託參謀次長熊斌（1894-1964）堅阻中央軍由保定前進，以免刺激日人。[92]

25 日深夜，日軍向平津間的廊坊發動攻擊。[93] 26 日，中日雙方又於北平廣安門發生衝突。[94]蔣中正即電宋詳示應變方針，提到「決心大戰」，要求宋從速部署滄保與滄石各線。[95]面對日軍的大舉進攻，宋哲元轉變態度，電蔣告以日軍刻正全力圍攻北平，情勢危殆，請中央作第二步準備，速派大軍由平浦線兼程北進，以解北平之圍，並調飛機助戰。蔣隨即電復立派大軍星夜兼程全力增援，同時派大員到保定策應，要宋靜鎮謹守，各部加深壕溝，固守毋退。[96]

蔣調兵遣將，指示「我軍應仍照原定計畫，在滄保、滄石二線上集中，構成陣地，期在此線上與敵作整齊之戰鬥」；[97]復批准軍委會擬定的作戰計畫，令孫連仲率部向永定河前進，萬福麟部、龐炳勳部皆在滄保線上構成陣地；[98]又電何應欽迅即將彰德高射砲二連（12 門）運往石家莊布防，限三日內運抵。[99]

28 日，日軍發動猛攻，南苑失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1892-1937）、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等官兵陣亡。[100]蔣電宋速離北平到保定

91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頁 194。

92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26-27。

93 〈宋哲元致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26 日），《蔣檔》，002-090105-00004-555。

94 〈宋哲元致何應欽密電〉（1937 年 7 月 26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221-222。

95 〈蔣中正致宋哲元電〉（1937 年 7 月 26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65。

96 〈蔣中正致宋哲元電〉（1937 年 7 月 27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68~069。

97 〈國民政府軍事機關負責人在蔣介石官邸會報決定事項記錄〉（1937 年 7 月 27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頁 127。

9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15-16。

99 〈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7 年 7 月 27 日），《蔣檔》，002-010300-00001-035。

10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 1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揮。[101]宋於當晚 6 時離平赴保，國軍於當夜完全退出北平城。29 日，蔣晨起閱電，知北平電話自 3 時起已無人接話，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守。對此，他已有準備，於昨日安排北平失陷後之部署，惟心中仍「痛悲無已」。[102]

平津失陷之速，出乎蔣意料之外。他對日外交強硬，欲以戰逼和，並未獲預期成效，再無迴旋餘地，[103]惟藉此危機，中央軍進入華北，蔣仍以為是其成功之處。[104]此後蔣對日全盤部署，仍聚焦華北，對軍事情勢並未消極，以為日本「政略與戰略皆已陷入絕境」，並認為「此誠最後之時機，若其不至於此，則余乃無機可乘也」。[105]蔣擬以洛陽、西安、彰德三地為大本營地點，並持續調兵北上。[106]

平津失陷之前，受宋哲元初時態度猶疑之阻，中央軍未能及時抵達平津一線，抵禦日軍進攻，雖部隊陸續進入河北，但輸送抵達滄保線者僅 4 個師。[107]平津失陷之後，蔣繼續調遣兵力趕赴河北，集中於滄保線、德石線。這些部隊，除一般的步兵師，並有戰車營、德式重榴砲營、卜福斯砲團、工兵團、化學兵隊，及戰車防禦砲等國軍較稀少的部隊。[108]

蔣中正周邊的軍政要員，秉承蔣對華北積極進軍之旨，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召開數次會報，規劃全國作戰部署，商討軍隊北調及各地防禦細節。幾次會報皆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召集，討論內容如決議「通知粵、

101 〈蔣中正致宋哲元電〉（1937 年 7 月 28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73。

102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28、29 日。

103 〈蔣中正致孔祥熙電〉（1937 年 7 月 30 日），《蔣檔》，002-070100-00045-025。

104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31 日「本週反省錄」。

105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31 日「本月反省錄」。

106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1 日「本月大事預定表」。

10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 15。

108 〈蔣中正致錢大鈞電〉（1937 年 8 月 2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21；〈蔣中正致商震電〉（1937 年 8 月 4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32；〈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7 年 8 月 4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30；〈蔣中正致林蔚電〉（1937 年 8 月 4 日），《蔣檔》，002-010300-00002-03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桂、川省等部隊準備，必要時，抽調部隊北上」，又如研究蔣方震建議蔣中正之作戰方案（後述）。北平戰事發生時，會報商討兩案，一為「將滄保線部隊推進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將主力之集中推進於滄保線」；二為「我中央軍仍在滄保及德石線上集中，而指導廿九軍退出北平，以保實力，免被各個擊破」。最後決議採用第一案，呈報蔣做最後決定。[109]

時華北軍事由徐永昌主持，他本為石家莊行營主任，平津失陷後，行營再向北推進保定，石家莊改設辦事處，徐任保定行營主任。[110]隨著劉峙集團更多部隊進入河北，劉出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平漢線之作戰；[111]宋哲元則出任第一集團總司令，負責津浦線北段之作戰。[112]

截至 8 月 4 日，北上增援部隊已到達指定區域者，有 8 個步兵師、1 個騎兵師又 1 個砲兵旅；至於輸送中的部隊，尚有 11 個師及 1 個獨立旅。[113]據日軍的調查，宋部撤出平津後的華北國軍兵力，有第二十九軍約 1 萬人往馬廠撤退；涿州、保定間有萬福麟、馮占海（1899-1963）等雜軍約 3 萬人；中央軍在保定、石家莊間有約 6 萬人，石家莊、順德間約 3 萬人，河南省北部、隴海鐵路沿線約 30 萬人，徐州附近約 5 萬人，合計近 50 萬人。[114]又據 8 月 7 日國防聯席會議上何應欽及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劉光的報告，彈藥準備依作戰需求分配，「黃河以北為三分之二，江南為三分之一」。全國第一期動員者 100 個師，預備軍約 80 個師，分配於冀魯等地 60 個師，於晉綏察 15-20 個師，上海、杭州、乍浦 10 個

109 〈盧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 年 7 月），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237、251、263。

110 〈何成濬致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18 日），《蔣檔》，002-090106-00003-162。

11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9。

11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1。

1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 47-48。

114 晉、察、綏不計。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頁 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師，福建、廣東等地 15 個師。其中，往河北者共約 50 個師，正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115]如此分配數目，則華北分配約 75 個師，高達 75%。可見國軍兵力正按戰前規劃，大舉增援華北。

抵達華北的部隊，蔣中正令其趕築防禦工事，即依戰前作戰計畫，於滄保、德石形成陣線，抵禦日軍攻勢。他並對前線細瑣指示陣地戰注重要點，[116]自記：「本週倭寇尚未向滄保線進攻，我軍集中計畫與工事程度，皆已成就七成矣。」[117]為了堅守陣地，蔣也重視積存糧米，要求河北各縣長負責屯積糧米，須存足 3 個月，復電示平漢與津浦兩路，至少運足前方所需糧秣 4 個月以上。[118]

（三）主戰聲浪與調遣反攻

華北的兵力投入、穩固陣線，並非僅消極陣地防禦，以拖待變；蔣中正有意主動發動攻勢，收復平津。這個想法受到不少主戰將領的支持。

早在 7 月 9 日，統籌指揮黃河以南中央軍的劉峙便上呈蔣中正一電，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本預定計畫，國軍若原地自衛恐被各個擊破，滄石線以北甚或為日軍占領；建議乘此時機，擬定整個作戰計畫乘勢進攻，一舉占領榆關沿長城至多倫之線。[119] 29 日，北平失陷後，劉峙又上電，判斷日軍必將大舉增兵，驅逐河北中央部隊，建議國軍準備大戰，先發制人，大舉進攻，消滅敵在平津一帶之勢力，以樹聲威。[120]

---

11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頁 30；〈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何應欽關於中央軍事準備報告稿〉（1937 年 8 月 7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290-292、336。王世杰誤將師數作人數。

116 〈蔣中正致林蔚電〉（1937 年 7 月 29 日）、〈蔣中正致孫連仲電〉（1937 年 7 月 30 日），《蔣檔》，002-010300-00001-043、002-010300-00001-052。

117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31 日「本週反省錄」。

118 〈蔣中正致徐永昌馮治安電〉（1937 年 8 月 11 日）、〈蔣中正致俞飛鵬電〉（1937 年 8 月 11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58~059。

119 〈劉峙呈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9 日），《蔣檔》，002-090105-00001-217。

120 〈劉峙呈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29 日），《蔣檔》，002-090105-00001-06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7 月 14 日，之後將出任大本營第一部作戰組組長的劉斐（1898-1983），上電蔣中正建議對日戰略。劉指出，此時宜以第二十九軍繼續抵抗日軍，「將內地國軍主力迅速推進接近前方（指平津之線以南）待機」，同時駐察、綏部隊與共軍及晉陝之一部適當集結，準備隨時進窺熱河方面，以牽制平津日軍，並且檄調川、桂軍主力進出豫境，一面與日本和平談判，一面表示重大決心；實施此舉，即如戰事暫時可免，亦於將來國防及政治有利。蔣見此電，批閱：「甚是。」[121] 17 日，蔣自記：「對倭不戰而屈之戰略，應注重還擊與反攻時機，不可太早，亦不可太遲」，[122]與劉斐進言若合符節。

18 日，前言提到素為各方所敬重的蔣方震，電蔣建議當前軍事部署。不同於一般認識，他多次強調的向後退軍、不重沿海、著重後方山嶽地帶、拖住敵軍等內涵豐富之持久戰略，[123]當時蔣方震認為石家莊為後方根據要點，應以此為據點，部署三師乃至五師以上兵力，之後戰局發展，山東實為全作戰之關鍵，應於徐州、蚌埠間預備十二列車以上，以備隨時進入山東；而長江一帶，可僅留少數部隊；總之「在給養可能範圍內，**儘量集中優勢兵力於北方**，利用數之多，以補器之乏」。[124]因此，實際上開戰之初蔣方震亦是主張增兵北上，將華北戰場置於關鍵地位。

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自戰前便力主向前推進，在華北開戰。平津失陷之後的 8 月初，法肯豪森以為如早些採取攻勢，必可將平津日軍殲滅，但當下再舉攻勢尚未太晚，因為部隊已經集中不少。[125]

除了劉峙、蔣方震、法肯豪森等人，軍政部常務次長陳誠是主戰最力的將領，建議於華北主動發動攻擊。盧溝橋事發一週，陳誠給蔣一簽

121 括號為原文內容。〈劉斐呈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14 日），《蔣檔》，002-080200-00280-007。

122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17 日「下週預定表」。

123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頁 185。

124 蔣批示此電抄送軍委會參考。〈蔣方震呈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18 日），《蔣檔》，002-080200-00280-009。

125 〈盧溝橋事件第三十次會報〉（1937 年 8 月 9 日），頁 2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呈指出，國軍既有不屈服之決心，則應攻擊前進，若坐以受擊、靜候敵人之增援，無異待斃，實兵家之大忌，一二八淞滬之役的失敗即為殷鑑；而且，此事變若為日軍預定計畫，國軍雖不攻敵而敵必貫徹其目的，國軍進攻反可挫折其企圖，並立於主動地位。[126]

陳誠如此主戰，看似未考慮日軍前方部隊與中央可能不同調，也不管局部戰事可能演為全面戰爭，僅考量軍事上立於主動。其實，他對日本內部與中國政情皆有思量，判斷日本政府根基不固而政黨財閥情況複雜，其關東軍為抵抗人事異動，亟思造成恐怖，一來緩和國內情形，一來延長關東軍官長之壽命；若遭到國軍之奇襲，必將窮於應付，而中國政府便立於主動；「總之今日祇有以決戰之準備與犧牲之決心，方可挫敵之凶燄，不然敵人得寸進尺，終無止境，且恐長此以往，民心發生變化，更將無法維持也。」[127]因此，他不斷鼓動蔣中正加大力度增援華北。

平津激戰之際，陳誠再度上電蔣中正，指出國軍雖不欲擴大戰事，但事實上日軍必令中國屈服而後已，建議在綏遠的湯恩伯部主動向察北出動，以拊敵側背，予以莫大之威脅。蔣接電後回復「所呈各點，已在分別辦理中」。[128]平津失陷後，陳誠又轉呈蔣中正、何應欽在前線的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的部署意見：「由津浦、平漢兩路，迅速規復平、津」，「現在河北之倭軍，不過二萬內外，且新得平、津，布署準備未周，一鼓前進，克復可期」。陳以為李的意見「頗有見地」，因此轉呈鑒核。[129]同日，陳並直接電蔣建議四事，以供即將召開的國防會議參考。其第四點指出，北平為中國八百年故都、文物之重心，又為外國使節館所在，影響國際觀感至鉅，「**必須分由平綏、平漢方面迅出大軍反攻，雖明知**

126 〈陳誠呈蔣中正簽呈〉（1937 年 7 月 15 日），《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以下簡稱《陳檔》），008-010701-00014-009。

127 〈陳誠呈蔣中正簽呈〉（1937 年 7 月 15 日），《陳檔》，008-010701-00014-009。

128 〈陳誠致蔣中正艷未參電〉（1937 年 7 月 29 日）、〈蔣中正致陳誠艷未參電〉（1937 年 7 月 29 日），《陳檔》，008-010701-00014-009。

129 〈陳誠轉李默庵陳平津陷敵後我方在政略戰略上應取對策密電〉（1937 年 8 月 3 日），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47-14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重大犧牲，亦不能顧」。[130]或許是看了陳的建議，蔣於次日日記寫道：「軍事能代研究者，辭修也。」[131]

8 月 7 日國防會議召開，陳誠於次日再度電蔣建議：

> 關於應戰方針，只有抱積極戰之目的，全面戰之方針。華北局部戰為敵之企圖，若我亦以局部應之，則我全陷於被動，且無勝算可操。職以為**我軍主力在華北應採殲滅戰，在大犧牲之下，能消滅敵人二三師，即足寒敵膽、振民氣。**而最大把握，仍在發動全面戰，主動的肅清腹地，如長江一帶敵人，減小我處處設防牽制兵力之顧慮。……利用大規模戰爭，調遣各省區部隊，因而減去割據之成分，為最良好時機，亦只有發動戰爭始能實行。[132]

陳誠主張將國軍主力置於華北，大舉出擊，並與長江一帶的作戰相配合，以全面戰與日軍爭勝；此外，藉戰爭收編地方軍事集團亦為考量重點，與蔣中正調兵北上破除華北割據的想法相一致。淞滬會戰爆發前一天的 8 月 12 日，陳又上電建議於華北主動攻擊：「近日敵之大部，向平綏路移動，其大舉進犯察綏之企圖，極為明顯，似**應即日毅然反攻平津**，同時劉汝明部及晉綏騎兵，迅速收復察北。」[133]

上列諸多文電，顯示陳誠與多位高級將領主張在華北與日軍大動干戈，這個聲浪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即已出現，平津失陷後更為顯明。統帥部內固然有何應欽、徐永昌等擔心戰事擴大的主和派，[134]這群主戰派的力量實不容小覷。[135]從蔣中正的調度與回應來看，主戰派對蔣中正的戰

130〈軍委會辦公廳向國防會議函送陳誠對目前抗戰問題建議〉，《戰史會檔》，七八七-2048。

131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4 日。辭修為陳誠字。

132 〈陳誠呈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8 日），《蔣檔》，002-080200-00486-029。

133 〈陳誠呈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12 日），《蔣檔》，002-080200-00486-035。

134 王建朗，〈盧溝橋事件後國民政府的戰和抉擇〉，《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北京），頁 58-60。

135 盧溝橋事變後的日軍有所謂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相關研究甚夥；國軍方面的研究多提到主和派，主戰派則論述鮮少，兩派的比較研究未來或可開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略有一定影響，尤其是其倚重的戰將、軍政部次長陳誠的建議。[136]

是時蔣中正的戰略，並非北守東攻，或讓華北國軍「向國內退軍」，其對華北依然相當積極，推動反攻部署。劉峙是他倚重的將領，平津失陷之後，蔣電示其率部由平漢路進攻北平，到保定籌劃一切，司令部人員可由豫皖綏靖公署人員兼任。[137]淞滬會戰前一天，蔣催劉速赴前方保定或定縣坐鎮。[138]其實劉峙已經出發，率綏靖公署幕僚由開封經鄭州北上，8 月 12 日進駐保定，派員四處偵查。15 日，徐永昌打電話給劉峙，轉告蔣指示南口方面吃緊，平漢方面部隊應施行佯攻。[139]劉當即與徐商議，擬定第二集團軍第一期作戰計畫，8 月 18 日呈報蔣中正。該計畫方針，以一部在固安附近牽制當面之敵，另一部沿平漢線前進，主力由房山縣西北山地向平北進出，協同南口友軍會攻北平。蔣閱此計畫，批示抄送大本營第一部（主管作戰）部長黃紹竑（1895-1966）研究，[140]並且於同日直接下令進攻，命令徐永昌、劉峙於平津、津浦兩路派有力一部，

136 陳誠這樣的態度，與其日後的回憶大不相同。陳誠於回憶錄指出，1936 年 10 月，蔣中正與他在洛陽已策劃抗日大計，即日軍利於由北向南打，而國軍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回憶錄又載，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滬會戰爆發後，蔣令陳誠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赴淞滬前線視察，18 日晚返京，陳即向蔣指出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陳誠因此建議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 1936 年所預定之戰略。蔣聽陳的報告後甚表同意，陳誠隨後出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增調部隊，赴滬參戰。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頁 23、52-53。陳誠的回憶錄為論者視為國軍主動移轉日軍作戰線或引敵南下的關鍵史料，若這段史料為真，對照陳誠自盧溝橋事變以來給蔣的數封電文，則陳似已改變態度，欲擴大淞滬戰事，引敵南下，移轉日軍作戰線。實際上，業有研究指出，陳誠回憶錄與戰爭當下的舉措有所落差，或是受後來戰事發展的影響，回憶錄將日後的戰略發展堆疊一起，而往前追溯至淞滬開戰初期。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23 期（2018 年 12 月，臺北），頁 123-138。

137 〈蔣中正致劉峙電〉（1937 年 8 月 6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37。

138 〈蔣中正致劉峙電〉（1937 年 8 月 12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61。

139 〈第二集團軍劉峙部在平漢線保定一帶失敗情況概要報告〉（1937 年 8-9 月），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53-154。

140 〈劉峙呈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18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7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向平津攻擊前進。[141]

8 月 22 日，保定行營參謀長林蔚電蔣中正，申述國軍於河北之三個作戰方案。由於前兩案難以實施，他建議採行第三案「敵平津取守，津浦與青島兩方面相呼應南下，我軍攻擊案」，國軍擬以平漢方面主力與南口方面軍相呼應，乘虛克復北平，同時以南口方面軍進出冀東，平漢方面軍側擊津浦沿線之敵，以切斷其後方聯絡而收前後夾擊之效。林蔚以為，該案利多害少，頗為可行，最後總結：日軍確實領有南口高地以前，於戰略戰術上，絕無積極南下企圖，而國軍如放棄南口高地，則爾後平漢主力軍之作戰至為困難，故無論採用何項方案，掌握東西一帶高地、警戒察北，為第一先決條件。[142]

林蔚的建議，經由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1893-1982）上呈，未見批示；實際上，林所言南口的重要性，蔣亦如是思考，因而詳加指揮部署。

（四）平綏線作戰的指揮部署

南口是平綏鐵路線上的要點，平綏線東起北平，中經察哈爾南部與山西北部至包頭，是華北聯繫蒙疆之交通大動脈。察南山道崎嶇，有居庸關天險，自南口經八達嶺至北口，為國防重地；[143]平津失陷之後，國軍為阻日軍向山西、西北發展，並希望以察南國軍威脅在平津的日軍，造成有利之反攻形勢，該處地位頓形重要。

蔣中正任命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1895-1974）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為副總司令，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144]主持該地防務。兵力計有劉汝明第一四三師、傅作義第三十

141 〈蔣中正致徐永昌劉峙電〉（1937 年 8 月 19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80。

142 〈林蔚呈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22 日），《蔣檔》，002-080200-00486-068。

14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3-4。

14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軍、李服膺（1890-1937）第六十一軍、高桂滋第十七軍、湯恩伯第十三軍等，屬西北軍、晉綏軍與中央軍。當中李仙洲（1894-1988）的第二十一師（屬第十七軍）、王萬齡的第四師（屬第十三軍）、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師（屬第十三軍）[145]為中央軍調整師，戰力較強，而傅作義部作戰歷史輝煌，亦有相當戰力。[146]

蔣中正對南口戰鬥的初步指示，為焦土抗戰及工事構築。他不斷要求前線炸毀青龍橋及八達嶺一帶鐵道，並且趕築工事，據守張家口；[147]同時，為穩固南口守軍後方，並襲取日軍熱河方面之根據地，[148]蔣督促前線主動向日軍占據的張北攻擊。[149]

在蔣連電催促之下，劉汝明的第一四三師及騎兵軍於 8 月 13 日向商都、張北發動攻擊。初時戰事順利，連克商都、尚義、崇禮等地，至 15 日攻抵張北城下。[150]

南口方面，日軍自 8 月 8 日拂曉發動攻擊，戰況激烈。蔣中正派遣劉峙集團分出的衛立煌部增援，13 日電在石家莊的衛立煌所部 3 個師向易縣輸送，經涞源及平西山地向南口迂迴增援，又先後下令以數個師增援反攻。[151]衛立煌部後來擴編為第十四集團軍，旗下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第八十五師屬中央軍調整師較具戰力的部隊。[152]蔣的戰略是以湯恩

14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第四篇第六章第一節插表第二。

146 胡平生，〈晉奉涿州之戰（1927-1928）及其影響〉，《臺大歷史學報》第 21 期（1997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59；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東京：講談社，2009），頁 193-225。

147 〈蔣中正致劉汝明電〉（1937 年 7 月 31 日），《蔣檔》，002-010300-00001-059；〈蔣中正致劉汝明鹿鍾麟電〉（1937 年 8 月 1 日），《蔣檔》，002-010300-00002-005；〈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10 日），《蔣檔》，002-010300-00002-079。

14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23。

149 〈蔣中正致鹿鍾麟電〉（1937 年 8 月 6 日），《蔣檔》，002-010300-00002-052；〈蔣中正致閻錫山電〉（1937 年 8 月 10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44。

15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7、25-26。

15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7。

15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第四篇第七章第一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伯部固守南口待援，來自平漢線的衛立煌部從背後夾擊，造成有利形勢擊破日軍；[153]衛立煌部的部署，也可說是前述劉峙集團北上夾擊日軍的延伸。

日軍面對南口正面攻擊的頓挫，轉用第五師團迂迴鎮邊城，向南口的後方懷來突進，南口國軍頓呈腹背受敵之勢。[154]守南口的湯恩伯部戰況激烈，而增援的衛立煌部行動遲滯，8 月 24 日蔣自記：「南口陣地為敵軍急性刺激重砲彈所迫，退守居庸關等各據點，衛總隊佔大村，仍不能與湯軍聯絡，焦急之至。」[155] 25 日，蔣電衛立煌督勵各軍師長打通與懷來聯絡線，增援湯恩伯部；同時電湯恩伯令各級主官死守勿退，盡速聯絡已占領大村之衛立煌。[156]

是時，第一四三師劉汝明部於張北攻勢不利撤退，日軍向張家口反攻，國軍無法抵禦。8 月 26 日，劉汝明以張家口被敵包圍，前線傷亡甚重，補給亦告斷絕，於中午下達撤退命令。[157]張家口國軍後撤，南口後路因之斷絕，守軍更形危險。蔣聞知，急電湯恩伯告以萬不得已時，可向蔚縣、廣靈、涞源一帶後撤。[158]未幾，蔣改變主意，電湯死守現地勿退，以待與衛立煌部聯絡。[159]當晚，蔣再電湯指示固守據點，至少應守住青龍橋與懷來，他並透露所以改變態度決定死守，是因為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 1886-1971）在滬被日機轟炸重

節插表第四。

153 〈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18 日），《蔣檔》，002-010300-00003-038。

15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4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7。

155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24 日。

156 〈蔣中正致衛立煌電〉（1937 年 8 月 25 日）、〈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25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2~163。

15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27-32。張家口戰鬥過程，另見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79），頁 116-120。

158 〈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26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4。

159 〈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26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傷，引起英日嚴重糾紛，國軍多守一日，則聲譽頓增，轉機亦大。[160]是日，蔣自記：「張家口雖失守，而居庸關湯（恩伯）軍仍固守未退，實為至難，湯誠罕世之名將也。」[161]

蔣中正 8 月 26 日的電報，湯恩伯 27 日才收到。實則，湯早已在日軍猛攻之下，於 26 日凌晨下令撤退突圍，並未如蔣所說「固守未退」。各部轉移後，湯奉到蔣令，已無法死守，遂依先前的命令，向廣靈、蔚縣移動集結。[162]

南口、張家口失守之後，蔣仍未消極，要求各部反攻，電湯恩伯：「速令比較完善之部隊反攻，恢復居庸關等各要口，圖與衛軍聯絡，轉敗為勝，定在此舉。」[163]不過，蔣後來意識到湯部已經沒有力量，乃於 28 日電林蔚轉衛立煌，指示如湯部無力反攻，則一面衛部與湯部切實聯繫，一面漸向平漢線西北地區移動。[164]南口、石家莊戰鬥至此告一段落。

8 月 31 日，蔣自記：「湯恩伯固守南口半月以上，雖告失敗，然足以寒敵膽而與懲創；若劉汝明能固守張垣，早下張北，則察省不致為敵所占也；昔日舊西北軍之將領害國，至今猶未已也。」[165]南口戰鬥自 8 月 8 日至 26 日，延續半個月，確為國軍在滄保線等其他防線，爭取不少備戰時間。[166]然而，爭取到的時間是否妥為利用？則是另一個問題。

160 〈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26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6。

161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26 日。

162 苟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出版地不詳：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1947），頁 24-25；王仲廉，《征塵回憶》，頁 175-177。

163 〈蔣中正致閻錫山電〉（1937 年 8 月 27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7；〈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7 年 8 月 27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68。

164 〈蔣中正致林蔚衛立煌電〉（1937 年 8 月 28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87。

165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31 日「本月反省錄」。

166 張皓，〈以空間換時間：蔣介石對南口會戰的部署及戰略意圖〉，《晉陽學刊》2014 年第 4 期（太原），頁 37-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決戰」與國軍潰敗

（一）華北部署的調整與陣地戰

七七事變之際，蔣中正並未發布全國作戰計畫，事發以來國軍整體戰爭部署，大抵依「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而行。8 月 20 日，大本營頒布「戰爭指導方案」、「國軍作戰指導計畫」、「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計畫」、「第三戰區作戰計畫」，正式公布國軍應對全局的計畫。前三者涉及華北的部署，於華北建立三個戰區：第一戰區作戰地域為冀省及魯北，司令長官以蔣中正兼，由徐永昌分別布達該區各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為晉察綏，司令長官閻錫山；第五戰區為蘇北（長江以北）及魯省，司令長官仍由蔣中正兼，以韓復榘為副。[167]蔣中正親兼其中兩個戰區的司令長官，可見其對華北的重視。

計畫指出，國軍作戰指導基本主旨是「持久戰」，主戰場之正面在第一戰區，主戰場之側背在第二戰區。[168]第一戰區主要任務，在拒止敵人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南下，應以平漢、津浦兩鐵路為軸心，以防守部隊採縱深疏散據點式之防禦配置，並以機動部隊控制於側翼，待機向敵側背圍攻而殲滅之。[169]作戰計畫呈現國軍擬與日軍在華北拉鋸，不僅採取守勢，並將見機反攻。

如前所述，蔣中正戰前已規劃中央軍對日部署，劉峙集團、湯恩伯部是其中核心，一南一北，前者尤其龐大，精銳盡出，衛立煌部、胡宗南部、孫連仲部皆屬之。湯恩伯部、胡宗南部、陳誠部是後來發展起來的中央軍三大軍系，前二者於戰前皆已駐華北及其周邊；其實，陳誠部

167 〈大本營頒國軍戰爭指導方案訓令〉（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34-39。

168 〈國軍作戰指導計畫〉（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40-42。

169 〈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指導計畫〉（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43-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開戰之初，也一度奉調北上增援。

戰前陳誠部（18A，轄 11D、14D、67D、98D）為中央軍剿共主力，兩廣事變爆發後南下，駐粵漢路沿線。平津失陷之後，陳誠力主向華北進軍，於 8 月 4 日奉命準備參加保定方面之作戰，7 日開始鐵路運輸，11 日先頭一部已越鄭州。後來因為 8 月 13 日淞滬會戰爆發，改向蘇州附近集結，成為淞滬方面的主力部隊。[170]

除了陳誠部，原肩負津浦、隴海兩路警備任務的胡宗南部，後來也於 8 月底南下參加淞滬方面的作戰。[171]至於稀缺的戰車或砲兵，原已部分開到冀南順德一帶，後來星夜調回上海，戰車防禦砲亦調兩連回滬。[172]國軍資深將領顧祝同（1893-1987），原先規劃擔任第一戰區所屬 5 個集團軍總司令之一，負責魯西之運河以西至黃河南岸，[173]後來臨時改為出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負淞滬戰場實際責任。[174]空軍方面，開戰之初蔣中正令空軍除南京、南昌、廣州防禦各隊外，「全部開赴華北前線」，[175]空軍積極準備隨時應援冀北軍事，及至淞滬虹橋事件猝發，日軍進攻上海態勢顯明，空軍當局不得不變更計畫，轉移主力至京滬地區，以拱衛首都京畿之安全。[176]

種種調動，可見淞滬會戰的爆發，對蔣中正的全局部署有重大影響。或謂國軍大舉增援華北，是為防備日軍對華北的急迫威脅，於淞滬挑起

---

170 〈第十八軍羅店寶山戰役經過報告〉（1937 年 8 月 23 日-9 月 30 日），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207。

171 徐枕，《一代名將胡宗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 153、157-158。

172 〈蔣中正致徐永昌電〉（1937 年 8 月 15 日），《蔣檔》，002-010300-00003-011。

173 〈盧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 年 7 月），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274。

174 顧祝同受命後，僅帶隨從一名赴任，並暫借第九集團軍張治中總部的辦公室指揮聯絡。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70。

175 〈嘉羅尼呈蔣中正華北前線空軍分配辦法〉（1937 年 7 月 22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57。

176 〈行政院新聞局「抗戰中的中國空軍」〉，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20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戰，移轉日軍作戰線，才是蔣中正規劃完妥的既定戰略。惟若考慮大軍作戰兵力龐大、期程較長、後勤複雜，具鈍重性，為計畫性的作戰，切忌臨機性的大幅變動；[177]蔣真有此戰略，理應在平津失陷、最後關頭到來之際，及早部署淞滬的全面攻勢，而非將精銳北調，迄於淞滬局勢緊迫之際，才轉調部隊並臨時指派指揮官。

其實，雖有不少原先增援華北的部隊抽調至淞滬戰場，全國各地部隊也陸續往淞滬前進，不過蔣中正仍對華北戰場十分關注，因而 8 月 20 日頒布的作戰計畫，將主戰場置於華北。

至於日軍，也將主戰場設定於華北。8 月底、9 月初，北支那方面軍訂定涿州、保定會戰指導方策，欲捕捉殲滅國軍於保定－滄州之線，主決戰方向在平漢線。[178]蔣尚不知日軍將於平漢鐵路發動大規模攻勢，以為日軍主力將沿津浦路直下，並企圖於海州登陸，進占隴海路，截斷國軍南北連絡，因此一度以為「全部戰略之弱點乃在山東」，[179]重視海州防禦及隴海線的部署，要求在地軍事長官積極防備。[180]

蔣通電河北各將領，日軍全面南進時，全軍官兵應與日軍在原陣地死拚到底，決不容有後退一步，否則概照連坐法就地槍決。[181]他對河北戰局仍具信心，於 9 月 4 日日記本週反省錄提到「河北敵軍進展甚遲，其力甚弱，只要我軍能努力固守，敵必老師鈍挫也」。[182] 11 日日記復

177 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頁 102。

178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統帥部內部對於從日本本土動員部隊增援有所遲疑，7 月 27 日最終決定派遣部隊。占領平津之後，復於 8 月 31 日編成北支那方面軍，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統轄第一軍、第二軍及其他直屬部隊，授命快速擊滅河北省中部的中國軍。9 月 4 日，寺內壽一下達保定會戰作戰命令，第一軍沿平漢路南進，與沿津浦路南進的第二軍協同。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 222、274-278；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19-323。

179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8 月 8 日。

180 〈蔣中正致韓復榘電〉（1937 年 8 月 30 日），《蔣檔》，002-010300-00003-093；〈蔣中正致黃杰電〉（1937 年 8 月 30 日），《蔣檔》，002-010300-00003-101。

181 〈蔣中正致河北戰區各將領電〉（1937 年 8 月 30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90。

182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4 日「本週反省錄」。

臺灣大學圖書館

長篇思考抗日戰略，提到我軍官兵應「在陣地內堅忍不拔」，「加強工事，多設偽裝」，「雖至最後之一兵一彈，亦必與敵在陣中抗戰到底」。[183]日記這些文字，後來經過修訂，於 13 日公開發表為〈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書〉，[184]通篇主軸是以陣地戰的堅守不退，摧毀日軍侵略野心。

依據蔣中正一貫的陣地戰指示及 8 月 20 日頒布的「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計畫」，徐永昌的保定行營策定「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實施計畫」。其要點在以必要兵力，堅強配置於津浦、平漢各陣地線，行強韌之抵抗，各部隊應固守城寨及據點，非有命令，不得後退；復以有力之機動部隊，控制於易縣以北山地，準備爾後之攻擊。此一計畫，於日軍攻陷南口之後，仍按原擬內容調整公布。[185]

時至 9 月中旬，國軍運用於河北的兵力，有第一（宋哲元）、第二（劉峙）、第十四（衛立煌）等 3 個集團軍，編入戰鬥序列者，約 42 個師及數個旅和保安隊，總兵力逾 30 萬人。[186]

這樣以大量兵力死守陣地的戰法，徐永昌雖奉命規劃與執行，但他於前線考察實際狀況之後感到不妥，9 月 13 日上電蔣中正，報告第一戰區「將來仍必有一度或再度之後撤」，其原因一為日軍兵器遠非國軍所能及；二為日軍在北方居於有利之內線作戰；三為日軍力能一致，國軍則不免紛歧。因此，徐永昌除建議加強多層工事，還強調應擬撤退的計

183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11 日「本週反省錄」。

184 蔣中正，〈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書〉（1937 年 9 月 13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3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242-243。

18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 16-17。

186 兵力判斷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第四篇第七章第一節插表第四、第四篇第七章第一節插表第六。原資料統計區域為平漢鐵路北段沿線，時間為 9 月 14 日至 12 月 28 日。由於資料中的參戰部隊，多數已於 9 月中旬抵達華北，之後增援有限，故可視作 9 月中旬的狀況。參戰人數數據為 297,347 人，未計第十四集團軍 3 個師及第五十八師、第三軍團 1 個師及第十三軍團 2 個師，故以逾 30 萬人計之。另外，國軍投入華北的部隊，尚須計算在山西、山東、河南等地之部隊，故全部數字逾於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避免如南口、張家口等地無計畫的後撤，「必進退有預定計畫，方不至有一潰莫救之虞」。[187]

徐永昌的上書，可見國軍於華北缺乏撤退計畫，其部署並非節節後撤、空間換取時間，而是「確實占領堅強之防禦陣地，**絕對拒止**敵人之前進」。[188]史料中並未得見蔣如何回應徐的建議，然而就在徐提議的次日，日軍便大舉發動涿州、保定會戰。

（二）滄保線的「決戰」

先是，9 月 5 日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在攻下張家口之後，沿平綏線向西進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擬以晉綏軍傅作義等部集結兵力於大同，倚恃有利地帶與敵決戰。[189]爾後閻錫山以大同附近地形不利，預期使用之兵力亦未全部到達，勝算至微，且日軍後續部隊源源不絕地開入，遂決定放棄大同，固守雁門關長城沿線。14 日，日軍進據大同。[190]

蔣中正非常重視晉北重鎮大同，因為該地為蘇俄貨運交通線上之要點，9 月 14 日聞大同失陷，自記：「本日得大同放棄消息，痛苦萬分。」[191]又記：「大同失陷，閻（錫山）之罪惡甚於宋（哲元）之平津，其為無膽識一至於此，實為夢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對於蘇俄之運貨交通，

187 〈上蔣委員長〉（1937 年 9 月 13 日），收入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 53-54。

188 〈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指導計畫〉（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44。

189 〈閻錫山致蔣中正電〉（1937 年 9 月 5 日），《閻錫山史料》（臺北：國史館藏），116-010101-0119-152。

19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太原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3-4；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13-316。

191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14 日。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生困難矣。」[192]蔣隨即轉移部署，令原在平漢線西北的衛立煌部主力，陸續秘密南向石家莊轉移。[193]

9 月 14 日，日軍規劃許久的涿州、保定會戰展開行動。[194]國軍受到大規模進攻，難以抵擋，24 日保定、滄州迅速失陷。[195]會戰期間，蔣中正十分憂慮，不過他雖感戰況不利，還是希望能與日軍在河北決戰，[196] 19 日手諭：「我軍應在保定附近與敵決戰」，劉峙的第二集團軍當即策定會戰指導。[197]

然而，國軍潰敗過速，決戰並未成真。22 日，蔣自記：「保定、滄州皆告急，部隊複雜，指揮無方，甚可慮也。」[198] 25 日自記注意：「一、保定似已失陷。二、敵威脅我遷都。三、敵擬進佔鄭州，以截斷中俄第二聯絡線。四、陝部緩調。」[199]同日日記的下週預定表，記有「布置德石線陣地」、「處理北戰場各潰軍」。[200] 26 日，自記注意：「平漢線軍潰敗，滄州亦已不守，北正面只可守沿太行山脈側面陣地矣」、「對各潰軍之整理方法與運用」。[201]由於節節後撤計畫闕如，大批輜重未能及時後運，後勤人員只能實施緊急處置，將輜重悉數焚毀。[202]盧溝橋事變以來，蔣中正不斷增兵及指示加強防禦的滄保線，就此輕易失去。

面對華北戰線的崩潰，蔣中正亟思補救，不再追求決戰。電令參謀

192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14 日。

193 〈蔣中正致衛立煌電〉（1937 年 9 月 14 日）、〈蔣中正致徐永昌劉峙電〉（1937 年 9 月 14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00~101。

194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頁 105。

19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24-327、333。

196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18 日「本週反省錄」、「下週預定表」。

19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 45。

198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22 日。

199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25 日。

200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25 日「下週預定表」。

201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26 日。

20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 8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長程潛（1882-1968），指示凡可作戰之部隊，均應以太行山脈為依據，趕速形成與平漢線平行之側面陣地為惟一要務，切勿追求決戰。[203]他對負責平漢線的劉峙十分不滿，下令查處。[204]第一戰區人事隨之異動，原司令長官由蔣中正兼任，改由參謀總長程潛代理，蔣之注意力漸從華北轉移開來。[205]

（三）國軍緣何輕易崩潰？

蔣中正的華北對日戰略，戰前已有規劃部署，戰爭初期中央軍劉峙集團也確能進入華北，最後何以在日軍一擊攻勢下迅速瓦解？其緣故可從地方軍、中央軍、協同指揮體系及敵對方日軍等方面來談。

首先就地方軍而言，是戰備不足。蔣中正擬以地方軍擋住日軍攻擊，再以劉峙集團、湯恩伯部南北增援，然而首當其衝的宋哲元部與中央仍不免隔閡，憂懼中央軍北上，漸次奪其地盤。[206]宋部基層固然抗日聲浪高漲，但所部將領態度不見得一致，內部有分化的壓力，[207]戰前已有日方嗾使張自忠、馮治安倒宋的傳言。[208]軍事部署上，宋部雖擴張到 7 萬多人，狀似頗具規模，實際上駐防區域過廣，備多力分，北上視察的參謀次長熊斌，為此曾向蔣報告宋部「分布散漫，無機會集合」。[209]其實，宋哲元與日方妥協之一大原因，便是因其部隊始終未能集結，如第三十

203 〈蔣中正致程潛電〉（1937 年 9 月 29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07。

204 〈蔣中正致黃紹竑電〉（1937 年 9 月 30 日），《蔣檔》，002-020300-00008-109。

2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 25；《蔣中正日記》，1937 年 9 月 27 日。蔣中正的注意力集中於淞滬、引敵南下及政略考量等問題的討論，可參見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第 46 期（2015 年 12 月，臺北），頁 61-101。

206 〈楊宣誠致唐生智報告〉（1937 年 7 月 22 日），《蔣檔》，002-080103-00025-007。

207 李君山，〈七七事變之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2019 年 6 月，臺北），頁 176-186。

208 〈調查統計局致蔣中正報告〉（1937 年 6 月 22 日），《蔣檔》，002-080200-00482-175。

209 〈熊斌致蔣中正電〉（1937 年 7 月 18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4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八師仍分駐八處，宋欲緩和一時，以便集中軍隊。[210]於是，在日軍向平津發動攻勢之前，宋哲元不得不撤收北平國防工事以取信日方。戰前宋哲元受到日本壓力，對工事構築已不積極，此際消極以對，防禦力量更顯不足。[211]

其次就中央軍而言，是北上遲滯。戰前劉峙集團早經準備，將在適當時機北上增援。盧溝橋事發之初，蔣中正下令部分部隊北上，惟宋哲元均令其停止於河北南境，意謂大軍北上必刺激日人，且保定防空設備全無，如大軍雲集，受日人空軍轟炸，難免遭受重大損失。[212]因此，劉峙集團抵達預定的保定一線時間頗遲，及至盧溝橋事發逾一個月，劉峙才於 8 月 12 日移駐保定進行部署。又劉峙集團的調動、兵站線路幾乎全恃平漢鐵路，多在夜間行進，車站、橋梁時被炸毀，以致補給及兵力轉用均極困難，加之通信網常為敵機及附日人士破壞，聯絡通訊大受阻礙。[213]因此，平津之役爆發時，劉峙集團並未能投入作戰，多數部隊尚未到達保定一線。爾後從劉峙集團分出的衛立煌部，欲增援湯恩伯部，所以遲遲無法會師夾擊，緣故也在運輸遲緩；[214]及至滄保「決戰」，劉峙集團仍是部署未畢，兵力分散。[215]

再次就中央、地方軍協同作戰與指揮體系而論，則可見指揮紛雜，系統紊亂。當劉峙集團北上進入華北，許多非中央軍的部隊納入指揮，系統不一，士兵性格、教育訓練及武器裝備各異，命令難以貫徹。由於部隊調動頻繁，劉指揮的部隊自始無明白規定，奉到訓令之後，又迭經

210 〈楊宣誠致唐生智報告〉（1937 年 7 月 22 日），《蔣檔》，002-080103-00025-007。

211 〈蔣中正致宋哲元電〉（1937 年 7 月 22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56；〈蔣中正致宋哲元電〉（1937 年 7 月 10 日），《蔣檔》，002-020300-00001-019。

212 〈楊宣誠致唐生智報告〉（1937 年 7 月 22 日），《蔣檔》，002-080103-00025-007。

213 〈第二集團軍劉峙部在平漢線保定一帶失敗情況概要報告〉（1937 年 8-9 月），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53-154。

2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 9。

215 〈抗戰簡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B5018230601/0026/152.2/50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更。[216]各軍多不聯繫，甚至一些部隊已經潰散，而鄰近尚且不知。[217]高級指揮系統亦有問題，劉峙之上為徐永昌，再上有在南京的統帥部及最高統帥蔣中正；蔣十分關注戰局，多次手令前線指揮，或直接打電話給劉峙，[218]於是命令政出多門，徐永昌不得不對此發出批評，以為蔣「用兵不甚深思，且與僚佐聲氣不一，所以軍隊每苦於更調之煩」。[219]

總之，劉峙準備並不充分，其事後檢討：「我軍此次作戰，乃被迫而行，準備當感不足。」[220]是役為劉之軍旅生涯首次重大挫敗，原先甚為蔣所倚重，掌握一支戰略集團以備中日戰爭；自是調往後方，衛戍重慶長達 6 年，中央軍將領的權力結構隨之洗牌，陳誠、胡宗南、湯恩伯繼之而起。劉日後回憶，將此次大敗推給現實環境，固然部分真確，[221]但其自身指揮也難稱出色，於許多場合驚慌失措，保定被圍時先行棄守，令關麟徵孤軍「呼天不應，叫地不聞」；[222]作為指揮體系的重要一環，劉峙指揮能力欠缺，亦為國軍華北大敗原因之一。

國軍在未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原先與日軍戰力即有的差距更為顯著，這可說是國軍潰敗的根本原因。是役，日本北支那方面軍編成兩個軍，第一線 6 個師團，第二線 2 個師團，總兵力高達 37 萬人，採迂迴包

216 〈第二集團軍劉峙部在平漢線保定一帶失敗情況概要報告〉（1937 年 8-9 月），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64-165。

217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37 年 9 月 29 日，頁 135。

218 劉峙，《我的回憶》，頁 147。

219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4 冊，1937 年 8 月 8 日，頁 98。

220 〈第二集團軍劉峙部在平漢線保定一帶失敗情況概要報告〉（1937 年 8-9 月），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64-166。

221 劉峙，《我的回憶》，頁 149。

222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頁 101；〈張華澜等為劉峙喪師失地提出彈劾提案〉（1937 年 10 月 26 日），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頁 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圍的殲滅戰法。[223]反觀國軍的訓練、裝備、士氣等皆無法與日軍比擬，劉峙集團、湯恩伯部雖具有中央軍較精銳的調整師，但數量不足。中日戰爭期間多數會戰，國軍兵力遠大於日軍，此次華北之役卻恰恰相反，國軍中央軍與地方軍合計約為 30 萬人，在數量上已成劣勢，實際戰力遂遠無法與日軍相抗衡。[224]

以上檢視國軍輕易崩潰的原因，令人不解的是，日軍既擁有龐大優勢，國軍弱點盡顯，何以日軍無法達到其殲滅華北國軍的目的？是否為國軍「空間換取時間」戰略奏效？

參與華北之役規劃的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參謀井本熊男（1903-2000），在戰後檢討這個問題。他肯定國軍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避開日軍鋒芒，在廣大領土中捨棄部分，使日軍占領地增加，治安維持益為艱難，然後等待國際變局與日軍疲困，實行最後的反攻，轉敗為勝。他並且以為，日軍戰略是徹底的殲滅方針、決戰主義，步兵操典在戰爭指導上強調速戰速決，無法應對主動撤退的國軍，當時日軍並主觀認為國軍撤退是因決戰失敗，誤判國軍遭到大敗可能馬上投降。[225]

實際參戰的井本對國軍的持久戰略有很高的評價，戰後日本編纂的官方戰史也認為國軍的「退避戰法」，使日軍速戰速決戰略無法奏效。[226]然而，這些論述對於國軍的判斷並不精確。如本文反覆申論，國軍在華北之役並不是主動後撤，吸引日軍擴大占領地，而是籌劃於城市或陣地與日軍持久消耗；那麼，為何日軍無法捕捉殲滅這些理當在城市或陣地中且沒有主動撤退的國軍？

---

223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 278。

224 國軍實際到達華北的調整師，主要是北上的劉峙集團關麟徵部（2D、25D）、衛立煌部（10D、83D、85D）、孫連仲一部（27D），以及原來在北方的湯恩伯部（4D、89D），共 8 個師。〈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敵我兵力比較表〉，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 34。

225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頁 220-222。

22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5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根本的原因是華北地域廣大而日軍兵力不足。日軍雖已出動相當兵力，欲一舉包圍殲滅國軍，數量上仍然匱乏，力有未逮。服部聰分析指出，日軍於華北短期決戰，雖曾編成戰車隊，將全國所有戰車投入，並且派遣相當數量的空軍，但戰車戰術是採步兵支援，未能發揮其機動力，且數量上仍十分欠缺。[227]若比較歐洲大規模包圍戰戰例，1940 年納粹德國對法國的閃擊戰，出動兵力高達 136 個步兵師，16 個機械化師，戰車 2,574 輛，飛機 3,600 架，日軍於華北之役僅出動 8 個步兵師團，兵力遠無法相比擬。[228]其實，日本參謀本部規劃使用在華兵力的時候，就清楚認識到這個問題，為保存龐大兵力防備蘇聯，對華作戰兵力因此捉襟見肘，最後於華北投入如此數量已屬不易。[229]

氣候是常為人忽略的另一因素。當時河北連日降雨，導致水災，戰地形成一大片濕地，對日軍作戰行動造成很大的阻礙。原先日軍規劃第一軍沿平漢路正面，第二軍沿津浦路同時出擊，後者接著將突進到平漢線上保定南側地區，與第一軍南北夾擊包圍殲滅國軍。因洪水氾濫之故，計畫屢屢變更。第二軍遭洪水所困，戰力難以施展，蔣中正又落井下石，將大運河及西河之堤防切斷，津浦線全被水淹，日軍行動困難，進展甚遲，兩軍遂無法合圍國軍，產生大殲滅的效果。[230]

因此，兵力、地理、氣候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下，日軍沒有達到其作戰目的。迄今日本多數戰史仍肯定國軍「空間換取時間」的成功，至少從華北之役來看，所論或可重新理解。

---

227 服部聡，〈日中戦争における短期決戦方針の挫折〉，收入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東京：錦正社，2008），頁 81-103。

228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頁 199-200。

229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頁 110-113。

23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1344800，《支那事変陸戦概史》（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上編，頁 137、150-153；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28、332；〈蔣中正致徐永昌等電〉（1937 年 9 月 4 日），《蔣檔》，002-020300-00008-093。

臺灣大學圖書館

結　語

1938 年底國軍召開南嶽軍事會議，蔣中正總結第一期抗戰（開戰至武漢失陷）的經驗發表演說，陳述國軍雖失去許多土地、死傷許多同胞，但在戰略布置上完全成功：

> 我們現在就是誘敵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所以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現在我們這種戰略的布置已經完成。[231]

蔣又說：「此期作戰，在戰略上仍本持久消耗之目的，以空間換時間，實行節節抵抗之持久戰。」[232]這幾段講詞，常為論者討論蔣中正對日總體戰略所引用，藉以說明蔣誘敵深入、節節抵抗，或是引敵南下之事實。然而，這個說法呈現其華北戰略的一面，而隱去了另一面。

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戰略在戰前已有規劃，在北邊布置湯恩伯部，南邊的河南、隴海線則部署規模更大的劉峙集團，含括衛立煌部、孫連仲部、胡宗南部等戰力較強的部隊。預定在開戰之初，華北地方軍就地抵抗，劉峙集團開進華北增援，占領陣地，示以決心，以戰逼和；若戰事擴大，則積極進取，與日軍決戰、第一次會戰、第二次會戰；而若戰況不利，便改採持久戰，節節固守，逐步消耗敵人。這個戰略同時具有西方、中國軍事背景。西方方面，德國軍事顧問有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陣地戰與主動攻擊之有效，尤其法肯豪森在土耳其的作戰經驗，使其多

231 蔣中正，〈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1938 年 11 月 2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5》（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485-487。

232 蔣中正，〈南嶽軍事會議手訂各項要則及第一期抗戰之總評〉（1938 年 11 月 2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5》，頁 56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次建議蔣不應在開戰之初便節節向後撤退，應主動向華北進軍，憑藉防禦陣地等待良好時機，主動攻擊日軍，在第一線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給予日軍重創。中國背景方面，過去對日作戰經驗，如一二八事變、長城戰役，國軍對日激烈抵抗，確能使日軍暫時停止進攻，可謂以戰逼和之先例。

盧溝橋事變後，蔣中正之戰略係以戰前的規劃為基礎，視戰況做調整。他希望交涉能導致和平，但對此不抱幻想，軍事上仍積極布置，全國動員，派兵北上，並要求平津趕築工事，預備大戰。其想法是多層次的，希望戰事不擴大，以戰逼和，也期待藉此時機，中央軍進入華北或收復冀東，擴張中央權力，壓制地方軍系。如是戰略獲得諸多主戰派將領的支持，如法肯豪森、劉峙、陳誠、劉斐等，一般認識蔣方震提倡「向國內退軍」或退守平漢鐵路一線，其實在開戰之初，他也是向蔣建議調動大規模兵力向前方作戰，「儘量集中優勢兵力於北方」。

或謂盧溝橋事變之初，蔣中正的決策是漸進的，其如意算盤是以進為退，局部解決，平津失陷以後才準備面對華北全面戰爭。依本文所論，蔣中正面對複雜時局，固然隨時調整其策略，惟大規模軍事調動具鈍重性，為計畫性作戰，其關於華北全面戰爭的軍事布置，依著戰前規劃的基調，自七七之始便已展開。蔣的軍事部署變中有常，其對日和戰考量、予地方軍系壓力，係與部隊推進並行不悖，並非臨機應變，軍事力量一直是其戰爭考量的重要籌碼。

平津失陷之後，最後關頭已然到來。劉峙集團源源不斷進入華北，全國擬投入 75%的兵力於此。國軍固守平津南面的滄保、滄石防線，構築工事，蔣並不斷細瑣指示工事構築，以待陣線穩固後發動反攻，奪回平津。平津西北側的南口，為平綏線上重要據點，也成為當時華北的重要戰地，蔣對此極其關注，指揮鉅細靡遺，欲藉湯恩伯部死守該地，牽制日軍，北上劉峙集團分出的衛立煌部裡應外合，增援打擊。就在南口熱戰之際，8 月 20 日大本營頒布一系列作戰計畫，主戰場仍在華北。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蔣對華北戰局期待甚殷。然而，南口、石家莊戰鬥失利，9 月中旬對蘇聯聯絡線上的重地大同失陷，同時開戰以來極其重視的滄石線輕易崩潰，「決戰」沒有發生，反成潰退，華北戰地的戰略價值遂大幅衰落。戰局所以急轉直下，原因概有宋哲元部備戰不足、劉峙集團北上倉促、部隊紛雜指揮混亂，以及最根本的國軍與日軍的戰力差距。值得注意的是，日軍並沒有達成其殲滅華北國軍主力部隊的目標，是由於戰地廣大、兵力不足，又遭遇洪水，各部未能同時發起攻勢，致使捕捉國軍主力的計畫功虧一簣。

一般認為蔣中正的對日戰略是「空間換取時間」，不僅他自己這樣陳述，後來的日軍戰史也這樣以為。其實依戰前的規劃，蔣的戰略可分第一線攻防進取和向後節節撤退兩種面向，開戰初期較強調前者，多數稱其戰略為「持久消耗」，「持久」與「消耗」時常並舉。蔣固曾考慮「空間換取時間」，然其內涵並非僅「向國內退軍」，而是相當重視在一定「空間」內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換取「時間」，節節後撤計畫相對忽略，甚且有意與日軍「決戰」；如此一方面在陣地「持久」，一方面「消耗」敵軍，應較接近蔣初期戰略的本質。[233]

要之，國軍「後來」戰略的演變，比較接近「空間換取時間」的一般認識，此為基於初期戰略調整、幾經演變的結果，所以後來還會看到如南京保衛戰的死守堅城，或是如 1939 年冬季攻勢的全面反攻等情況。[234]這不僅是蔣中正政略的考量，也是長期軍事戰略演變的結果。透

233 此一情態亦鮮明反映蔣的個性，各戰場皆想掌握，都不願放棄，對照後來國共內戰的戰略，可見其相似性。

234 戰爭次年，法肯豪森呈送蔣中正一作戰經驗報告，指陳「防禦」即固守陣地直至最後一人，與「持久抵抗」即獲時間餘裕之戰鬥，兩個詞彙在國軍欠缺明晰。他強調防禦時不宜計及後退及後方陣地，「祇須絕對固守、持久抵抗，敵如接近亦應戰鬥，不宜後退」。蔣中正肯定法肯豪森的建議，將之以自己名義頒發為各部隊之教條，並將末句改為「不宜作逐次後退之想」。〈法肯豪森致蔣中正報告〉（1938 年 1 月 23 日），《蔣檔》，002-020300-00004-015。此亦呈現國軍初期戰略在第一線持久與節節後撤之間的張力與演變過程。

臺灣大學圖書館

過本研究，可以看見歷史中個體選擇的複雜性，想和做之間的張力，以及歷史的多重指向。

*本文為 2016 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2-1937）」（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292-005）之研究成果。論文撰寫及出版期間承蒙劉維開、林桶法、黃自進、李君山、張鑄勳等先進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教，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歐陽宣　黃方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日記》，史丹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閻錫山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王仲廉，《征塵回憶》。臺北：作者印行，1978。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臺北：國史館，2010。
克勞塞維茨著，張柏亭編譯，《戰爭論》。臺北：國防部，1956。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2 期，1991 年 2 月，臺北，頁 45-100。
於憑遠、羅冷梅編纂，葉霞翟、胡為真校訂，《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林　蔚原著，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1）》。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
苟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出版地不詳：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1947。
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編，《孫連仲回憶錄》。臺北：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1962。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格魯塞威止著，瞿壽禔重譯，《大戰學理》。北京：武學官書局，1915。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臺北：國史館，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善豪翻譯，《德國外交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傅作義，〈綏戰經過詳記〉，《軍事雜誌》第 100 期，1937，南京，頁 285-304。
傅亞夫，〈劉峙先生傳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2 輯，頁 475-481。臺北：國史館，1994。
黃 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
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劉 峙，《我的回憶》。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劉 峙著，劉滌宏編，《高級傳令兵：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臺北：秀威資訊，2019。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79。
蔡 鍔輯，《曾胡治兵語錄》。出版地不詳：四川武學官書局，1917。
蔣中正，〈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4》，頁 605-616。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蔣中正，〈最近軍事與外交〉，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4》，頁 617-626。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蔣中正，〈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1938 年 11 月 2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5》，頁 484-497。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蔣中正，〈南嶽軍事會議手訂各項要則及第一期抗戰之總評〉（1938 年 11 月 2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15》，頁 549-568。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蔣中正，〈對研讀克勞塞維茨「戰爭原理」的提示〉，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24》，頁 172-175。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蔣中正，〈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書〉（1937 年 9 月 13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30》，頁 242-24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大東亜戦争海軍戦史本紀巻 1》。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上編。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土肥原賢二刊行会，《秘録 土肥原賢二——日中友好の捨石》。東京：芙蓉書房，1972。
司馬亨太郎訳，《巴爾克戰術書》。東京：干城堂，1913-1914 年大改訂第 4 版。
Balck, William. *Development of Tactics-World War.* Translated by Harry Bell. Fort Leavenworth, Kans.: General Service Schools Press, 19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General der Infanterie z.V.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http://www.specialcamp11.co.uk/General%20der%20Infanterie%20Alexander%20von%20Falkenhausen.htm (accessed May 28, 2020).

二、近人研究

王建朗，〈抗戰初期國民黨軍事戰略方針述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上海，頁 100-104。

王建朗，〈盧溝橋事件後國民政府的戰和抉擇〉，《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北京，頁 149-163。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余子道，〈中國正面戰場對日戰略的演變〉，《歷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北京，頁 138-152。

佚名作，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新北：老戰友工作室，2020。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頁 50-10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李君山，〈1935 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國派系之爭——由「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戰前中日關係之複雜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46。

李君山，〈抗戰前軍用教範的初步考察（1931-193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1 期，2006 年 10 月，臺北，頁 67-93。

李君山，〈七七事變之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2019 年 6 月，臺北，頁 137-194。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步　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　第 2 卷：戰時軍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沈荊唐，〈湯恩伯〉，收入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 1 卷，頁 246-247。北京：中華書局，1978。

岩谷將，〈從盧溝橋到上海——再論中日戰爭初期的展開〉，收入黃自進主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上冊，頁 229-268。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

胡平生，〈晉奉涿州之戰（1927-1928）及其影響〉，《臺大歷史學報》第 21 期，1997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60。

徐　枕，《一代名將胡宗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太原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張 皓，〈以空間換時間：蔣介石對南口會戰的部署及戰略意圖〉，《晉陽學刊》2014 年第 4 期，太原，頁 37-51。
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 50 期，2016 年 12 月，臺北，頁 97-146。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陳長河，〈國民黨政府參謀本部組織沿革概述〉，《歷史檔案》1988 年第 1 期，北京，頁 110-111。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
傅應川，〈抗戰戰略的變遷〉，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第 2 編：軍事作戰》，頁 21-47。臺北：國史館，2015。
曾景忠，〈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對冀察當局的應戰督導〉，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85-118。臺北：國史館，1998。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
黃自進，〈再探中日戰爭擴大之過程——以盧溝橋事變為中心〉，收入黃自進主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上冊，頁 269-328。臺北：稻鄉出版社，2019。
楊天石，〈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頁 121-138。香港：三聯書店，2010。
楊奎松，〈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七七事變爆發 7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楊維真，〈1938 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國史館館刊》第 32 期，2012 年 6 月，臺北，頁 33-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葉　銘，〈徐永昌與抗戰初期華北戰局（1937 年 7 月-9 月）〉，《政大史粹》第 31 期，2017 年 3 月，臺北，頁 51-78。

劉鳳翰，〈陸軍與初期抗戰〉，收入氏著，《抗日戰史論集》，頁 191-262。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蔣緯國總編纂，《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 4、10 卷。臺北：黎明文化，1978。

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一九一四──一九三七）》。香港：中華書局，2017。

蘇聖雄，〈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國史館館刊》第 28 期，2011 年 6 月，臺北，頁 31-71。

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第 46 期，2015 年 12 月，臺北，頁 61-101。

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23 期，2018 年 12 月，臺北，頁 123-138。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出版公司，2018。

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新史學》第 31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臺北，頁 129-198。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一九二八──三七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7。

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

服部聡，〈日中戦争における短期決戦方針の挫折〉，收入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頁 81-105。東京：錦正社，2008。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庄司潤一郎、川島真，《決定版　日中戦争》。東京：新潮社，2018。

家近亮子，《蔣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東京：岩波書店，2012。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

鹿錫俊，《蔣介石の「国際的解決」戦略：1937-1941──「蔣介石日記」から見る日中戦争の深層》。東京：東方書店，2016。

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東京：講談社，2009。

森潤三郎，《鷗外森林太郎》。東京：丸井書店，1942。

Dolev, Eran. *Allenby's Military Medicine: Life and Death in World War I Palestine.* London; New York : I. B. Tauris,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aufmann, J. E. and H. W. Kaufmann. *Fortress France: The Maginot Line and French Defenses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6.

Liang, Hsi-Huey.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 Assen: Van Gorcum , 1978.

van de Ven, Hans.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6 (Dec. 2020), pp.97-15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012_(66).0003

Trade Space for Time?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Plan against Japan for North China, 1935-1937

Su, Sheng-hsiung*

Abstract

Regarding Chiang Kai-shek's strate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scholars have often highlighted either the status of diplomatic operations o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warfare in North China after the fall of Beiping-Tianjin have not received such high attention.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Battle of Shanghai led to the retrea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rom its power base on the Lower Yangzi and forced it to reshape its wartime geopolitics later.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battle, the Incident of Marco Polo Bridge in Beiping triggered the military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North China was the battlefield parallel to Shanghai.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hiang Kai-shek's strategy and his overall military layout for North China before and righ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o-called "trade space for time" and offer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ang developed the war pla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Liu Zhi（劉峙）,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Battle of Shanghai.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01, Taiwan (R.O.C.);
E-mail: mhsheng@gate.sinica.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